

红旗

○
一九七二年 6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二年第六期 目 录

抓紧路线教育 认真看书学习

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胜利

——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4）

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

——学习《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一点体会……………宇文平（8）

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前进

——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创作体会……………上海市《龙江颂》剧组（14）

经常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云南冶金第一矿的调查报告……………（24）

对技术人员进行路线教育的一些经验

——吉林热电厂的调查报告……………（28）

读一点有关帝国主义的历史

——三谈读一点世界史……………史 军（33）



总结经验 执行政策

进一步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朱 郁 (41)

总结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的经验.....钟力成 (46)

干部必须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江苏涟水县前进大队的调查报告..... (54)

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 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驳“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田志松 (60)

文艺问题上两种认识论的斗争.....方 刚 (68)

“复制天才”论是反动的优生学的新变种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 梁正兰 (74)

☆ 六月一日出版 ☆



毛主席语录

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



毛主席语录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毛主席语录

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象钢铁一样。



抓紧路线教育 认真看书学习

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 就是胜利

——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三十周年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今天，我们满怀革命豪情，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

毛主席的这部光辉著作，是在三十年前两条路线的大论战中产生的。这部著作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批判了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文艺路线，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系统地、深刻地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党制订了一条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这部著作是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文艺、改造世界观的战斗纲领，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在三十年来的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今天仍然是我们党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巩固无



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武器，是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必读的经典文献。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讲话》发表以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在日益广大的范围内掌握了群众，革命文艺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在武装夺取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风雨中不断前进。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包括文艺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革命样板戏空前普及，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运动正在兴起，戏剧（包括地方戏曲）、电影、音乐、舞蹈、美术、文学以及其他艺术领域，正在涌现出一批好的或较好的作品。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队伍在同工农兵结合的过程中，正在逐渐成长和壮大。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政治路线的斗争，总是首先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反映出来。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从延安时代对以《文学与生活漫谈》、《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等为代表的反党逆流的批判，全国解放后对反动影片《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适派主观唯心论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直到对反动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推动了政治战线的革命步步深入。在这个过程中，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分子周扬等“四条汉子”之流，追随他们的总头目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先后登台表演，向毛主席革命路线疯狂反扑，他们利用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抵制和破坏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对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所有这些斗争，无一不是尖锐地反映着每个历史时期政治路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搏斗。三十年惊心动魄的路线斗争告诉我们：这种斗争今后还要长时期地继续下去，对路线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经常地开展**“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才能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正遵循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深入开展对刘少奇一类



骗子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和斗争。这场斗争，是党内五十年路线斗争的继续。刘少奇一类骗子及其代理人周扬一伙，都是善于伪装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三十年斗争的经验证明：只要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自觉地跟党的正确路线，就能逐渐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揭露一切假马克思主义骗子手的真面目。今天，纪念《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首先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以《讲话》为武器，进一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各种反动思想。

要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讲话》精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刘少奇一类骗子否认认识来源于实践，宣扬什么“超天才”、“先知先觉”，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一切革命知识分子、革命文艺工作者，要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中去，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改造世界观，转移立足点，学习和总结亿万工农兵所创造的宝贵经验，努力反映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

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论，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刘少奇一类骗子从剥削阶级的精神武库中，拣起破烂的人性论，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毛主席在《讲话》中，对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人性论的种种表现，早已作过彻底的批判。我们要按照《讲话》的要求，努力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践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共产党员要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对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对一切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言行，要以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坚决斗争到底。要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反对剥削阶级的唯心史观。是人民群众创造



历史，还是少数“英雄”创造历史，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历史观的斗争。《讲话》深刻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的光辉思想。刘少奇一类骗子却颠倒历史，否定工农兵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作反革命的舆论准备。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学习和掌握唯物史观，联系当前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分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不断增强路线斗争观念。

无产阶级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各级党的组织，要从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重视并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认真总结经验，加速文艺战线斗、批、改的步伐。一是抓路线，抓方向，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排除形形色色来自右的和“左”的方面的干扰和破坏，经常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不断肃清刘少奇一类骗子在思想文化战线的种种流毒。二是抓党的政策的落实，切实搞好文艺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特别是要切实抓好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正确地发挥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逐步提高他们的路线斗争觉悟和思想、业务水平，在斗争实践中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文艺队伍。三是抓发展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坚决贯彻毛主席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经验，勇于实践，敢于创社会主义之新，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努力适应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适应广大工农兵日益增长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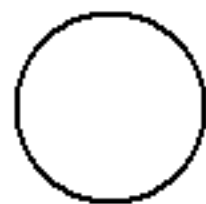
历史在前进，革命在深入，批修整风运动正在推动我国各条战线事业的发展。无数事实反复证明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会不断夺取新的胜利。让我们更高地举起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

——学习《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一点体会

宇文平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为总结当时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反右反“左”的经验而写的。在这篇光辉著作中，毛主席通过对晋绥工作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全面分析、总结，深刻阐明了“全党同志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的重要性，着重指出：“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对于我们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指示，提高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和政策水平，正确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政策，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很重要的。

毛主席在领导我国革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为我党制定了正确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引导我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是这样。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了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并明确规定了解决这两种矛盾的路线和政策。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再次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



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提出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指出了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提出了解决矛盾的任务、步骤和方法，规定了必须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这个总政策，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和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怎样才能发挥自己的先锋队的作用。它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胜利前进的灯塔。

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实质，就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是围绕着坚持还是改变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个根本问题展开的。刘少奇一类骗子，妄图通过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达到他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他们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来干扰和破坏我们党制定的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归根到底，也就是要从各个方面来改变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还是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的斗争，还要长期进行下去，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进一步提高路线斗争的自觉性，深刻认识毛主席说的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切不可把长期性看作短期性，把复杂性变为简单化。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使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在各条战线上得到有力的贯彻执行。只有紧紧地掌握党的基本路线，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和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应发挥的作用，我们才能在各种情况下，都不被一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努力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成为头脑清醒的革命者。我们在工作中犯不犯大的错误，成功或失败，关键就在这里。



党的基本路线规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总任务和总目标，这就是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为了完成这样一个总的任务和达到这个总的目标，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要经历若干个阶段，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有许多不同的具体工作要做。就战线来说，分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教育的等等。各条战线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担负着不同的具体任务。党制定了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来保证这些具体任务的完成。但是，这些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都是从属于党的基本路线，并为它服务的。工业要抓以钢为纲，农业要抓以粮为纲，但是不管工业、农业，或者其他各条战线，都要抓住党的基本路线这个总纲，才能有正确的方向。党的基本路线反映了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共同的矛盾和解决这个矛盾的共同的步骤和方法；而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则是反映了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特殊矛盾和解决这些矛盾的特殊步骤和方法。不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就不能很好地完成党的各项战斗任务，党的基本路线就不能实现。而在贯彻执行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过程中，如果不从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去认识和领会它们，懂得它们的精神实质，或者甚至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也就不可能正确地贯彻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就可能会从“左”的方面或右的方面脱离正确的轨道，走到邪路上去。

党的基本路线规定了必须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总政策，这是党制定一切具体政策的根据和准则，也是我们正确执行各项具体政策总的指导思想。把本来是敌我矛盾看作是人民内部矛盾，分不清敌我，认敌为我，就要犯右倾的错误；把某些人民内部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敌我矛盾扩大化，就要犯“左”倾的错误。犯右倾错误或犯“左”倾错误的共同点，都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反过来，各项具体政策，如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对敌斗争政策、经济政策等等不落实，就必定会影响总路线和总政策的贯彻执行，就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不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



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由此可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包含着正确处理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内部各种阶级关系。因此，我们既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要认真执行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要在完成每一项具体任务中，把党的总路线、总政策同具体工作路线、具体政策辩证地统一起来。

党的基本路线反映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以来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总是高一阵，低一阵，过几年就有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出现。每一次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胜利，总是推动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大大前进一步。所以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只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才能认清事物的本质，掌握客观规律，完成党的各项战斗任务。如果忘记了阶级斗争，也就会忘记党的基本路线。有的同志在实际工作中有时忘记党的基本路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头脑里阶级观念淡薄，或者对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把阶级斗争时起时伏，误认为时有时无，把阶级斗争形式上的变化看成阶级斗争的消失。事实上，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着的，不是我们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而是如何掌握它的规律，因势利导，夺取胜利的问题。我们必须不断肃清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流毒，加强阶级斗争的观念，自觉地以党的基本路线来指导我们各项革命工作。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提倡顾全大局。”党的基本路线是从革命的全局出发制定的，是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根本目标的。为了实现这样一个根本目标，就需要各个局部完成党的各项具体任务。局部是重要的，没有局部，也就失掉了全局。但是，局部是受全局统帅的，“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代表整体、统帅全局的。如果我们在各项工作中，不从全局出发去紧紧掌握党的总路线和总政



策，只埋头于具体任务，就会做不好革命工作，甚至会各自为政，把局部工作强调到不适当的位置，颠倒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忘掉党的基本路线，迷失方向。因此，要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贯彻到各项具体工作中去，必须经常进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真正了解和懂得全局和局部的关系，自觉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着革命的总目标奋勇前进。

党的基本路线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也体现了党在当前历史阶段中的基本任务。如果只注意当前的利益，而忘记了广大人民根本的、长远的利益，或者只看到长远目标，看不到实现这个目标必须经历的步骤，都会背离党的基本路线。这样，在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站不高，看不远，抓不紧，就不能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就弄不清为什么那些该做，那些不该做，那些今天就可以做，那些明天才能做，成为一个盲目的不清醒的革命者。例如，“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是党在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它是为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服务的，是符合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当前要求的，是适合当前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群众觉悟程度的。我们掌握了党的基本路线，就能坚定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如果忘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长远目标，忘记了还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那末，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就有可能忽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这个根本内容。另一方面，如果忘记了政策的现实根据，主观地乱提口号，自立政策，把将来才能做到的事硬要拿到今天来做，那也会脱离群众，把事情办坏。这两种情况，都会脱离党的基本路线，也都会破坏党的政策的正确执行。毛主席教导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我们在作计划、办事情、想问题时，既要重视人民群众当前的利益，又不要忘掉长远的利益；既要明确革命的长远目标，又要努力完成当前各项具体任务。如果只注意当前的利益，忘掉了长远的利益，那末，当前的利益最终也是要失掉的。我们在具体工作中，只有紧紧掌握党的总路线，才能把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统一起来，使革命一步一步地继续前进，最终实现革命的总目标。



紧紧地掌握党的基本路线，正确地执行党的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是我们做好工作、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在工作中，不是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就是执行错误的路线和政策，不是自觉地执行，就是盲目地执行。要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认真学习。对党的路线和政策学习不够，理解不深，就掌握不准，贯彻不力，在行动上必然带有盲目性。党的路线和政策是建立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基础之上的，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才能从根本上理解党的路线和政策的精神实质，才能识别和抵制那些违背党的总路线的倾向和口号，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中才有坚实的思想基础。党的路线和政策是遵循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产生于革命斗争的实践而又指导革命斗争的实践。因此，我们在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过程中，不能满足于辛辛苦苦与良好的愿望，而必须加强调查研究，把党的路线和政策同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把各项工作做好。学习、掌握和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必须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骄傲自满等不良思想作风，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都是正确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的障碍。因此，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自觉性的重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是不可能真正掌握党的基本路线，把我们担负的革命工作推向前进的。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事实证明，那条战线、那个地区、那个部门，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总路线，紧紧抓住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方向就明确，工作就发展。否则，就会迷失方向，产生错误，使工作遭到损失。因此，在当前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中，必须加强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并把这一教育同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结合起来，同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和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结合起来，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一步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前进

——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创作体会

上海市《龙江颂》剧组

在全国人民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回顾《龙江颂》的创作过程，更加亲切地体会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引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的正确，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重要意义。每当我们照《讲话》的精神做了，《龙江颂》就前进了，提高了；而什么时候如果违背了《讲话》的精神，就会出现反复和曲折。《龙》剧的诞生和成长，是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胜利。

下面，我们就《龙》剧的创作实践，谈一点初步的体会，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遵循党的基本路线，从工农兵实际生活出发， 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人民

一切种类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反映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歌颂我们时代的主人——工农兵群众创造历史的丰功伟绩，通过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塑造来展示他们崇高的精神面貌，这是社会主义文艺极其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工农兵的斗争生活是无限丰富、极其广阔的。一部作品当然不可能包罗万象，它只能通过个别反映一般，通过矛盾的特殊性来表现矛盾的普遍性。这就要求我们遵循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从实际生活出发，“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龙》剧所描写的龙江大队淹三百、救九万的生动事例，是一个重大的题材，当然也是一场特殊的斗争。但在这场特殊的斗争中，贯串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这是在特殊的矛盾中所包含的普遍的规律性的东西。只有在深入工



农兵群众斗争生活的过程中，通过“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才能在特殊的矛盾中逐步理解和把握这个普遍规律。

在《龙》剧创作的初期，我们也承认堵江抗旱既是一场战天斗地的艰苦斗争，更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尖锐斗争。但在创作实践中，却碰到各种思想障碍。其中之一就是“无冲突论”。这种理论，就是只承认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承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更否认在党内、在人民内部也有路线斗争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这种理论的流毒一度影响到《龙》剧的创作。有的人就曾经片面渲染和夸大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还为江水英设计了一个拆屋献柱以抢救大坝的惊险情节，以为这样才能突出江水英的英雄性格。但效果恰恰相反，由于丢掉了阶级斗争这个纲，不仅矛盾冲突得不到加强，而且对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江水英的英雄形象作了不正确的描写。这个教训使我们体会到，革命的主题思想和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是不能单纯通过人与自然的矛盾来表现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坚持或者否定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正是无产阶级文艺同修正主义文艺的根本区别所在。“龙江风格”所反映的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只能产生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时代。它是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代替私有制，共产主义思想战胜私有观念的结果。所以它只能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斗争的产物。作为“龙江风格”的化身——江水英式的英雄人物，也只能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涌现和成长起来。要刻画江水英的英雄形象，最主要的是刻画她的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这就有一个如何写阶级斗争，特别是如何写党内、人民内部的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的问题。

江水英和李志田的矛盾有没有典型性？生活本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堵江抗旱的斗争中，大量存在着的一个矛盾就是全局观念与私有观念的矛盾，也即共产主义风格与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又主要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不在群众而在于干部。以为写领导班子，只能写团结，不能写斗争的思想，是不符合生活本身的辩证法的。开初，我们不敢大



胆揭示和展开江、李之间的思想斗争，总想把这一矛盾抹抹平，当两种对立的思想稍一接触，就让李志田轻轻快快地转变。结果是转变得快，碰上新的问题反复得也快，主题思想和矛盾冲突都不能向纵深发展。观众也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李志田怎么一会儿通了，一会儿又不通了？江水英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可见，不敢充分展开江、李之间两种思想的斗争，不仅李志田不能合情合理地转变，江水英的革命风格和她对李的教育作用也不能充分表现出来。

实践的经验证明：只要把握住矛盾性质，把李志田的基调定准了，在共产主义风格和本位主义思想这对矛盾的范围内，就完全可以充分揭示和展开矛盾，不会发生“过线”的问题。《闸上风云》一场，李志田冲着江水英发出连珠炮似的责问：“你只知一个劲儿丢、丢、丢，却不管社员愁、愁、愁”，一下子把矛盾推向顶点。阿坚伯等其他干部、群众都气愤地两次要上前制止，但被江水英两次拦住，一个女社员扑到江水英身上抽泣起来，台上出现了一个令人激动的静场。这一处理使戏剧冲突的效果更加强烈。这么尖锐、激烈的面对面的斗争，有没有发生“过线”的问题呢？没有。因为通过前面情节的铺垫，使观众心里有了两个底：一是对李志田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看法，他对江水英的指责并没有损害他的基本阶级品质；二是江水英的一系列先进事迹大家都清楚，李的责问并不会损害江的形象。相反，反映客观实际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矛盾冲突表现得越鲜明，对刻画江水英的英雄形象，越有好处。因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正是在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中，江水英的谦虚谨慎，沉着耐心，对战友的阶级深情和对敌人的阶级仇恨，她的高度的无产阶级党性，她的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境界，才能得到充分的表现，发出夺目的光彩。

江、李思想斗争的一个集中点，是公私观的问题。我们为江水英写了这样一段痛斥黄国忠的谬论的台词：

王国禄口口声声说什么他“是为大家着想！”他说的“大家”是咱龙江大队吗？不是！他是为谁着想？他是为着他那个阶级！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公与私，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公私观。

李志田和黄国忠当然不能相提并论。但是他不懂得这个简单明了的道理，自以为是“为集体担负责任”，其实他心目中的“集体”，只是一个“扩大了私字”。本



位主义思想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而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地主资产阶级也有它们的公私观。它们所谓的“公”，就是它那个阶级的阶级利益的集中表现。他们所谓“天下为公”，就是要“天下”的人都服从或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和剥削制度。这种“公”是建筑在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利己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的公私观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地主资产阶级的公私观是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因此，无产阶级所说的“公”，是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集中表现，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最终目的是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江水英一心为公的具体的阶级内容。

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这三者关系的问题，都有一个如何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正确处理公与私这对矛盾的问题。江水英和李志田，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思想冲突。

江水英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她遵循毛主席“要提倡顾全大局”的教导，一切都以党的利益为出发点。但是，对江水英这一宝贵品格，我们曾经理解得过于简单：对她的描写只是一个劲儿强调丢，丢，丢，以为这才是发扬风格。而对李志田，写他对龙江大队土地的感情，写他对大队的生产和社员生活的实际问题的关心，却很具体：提出补救措施的是他，带领群众苦战三千亩的是他，提出加高河堤抢救大田的又是他。而江水英反而只说不做。结果，观众的同情倒向了李志田的一边。这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不能把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简单地归结为“丢”，更不能和巩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对立起来。如果江水英不是积极地依靠群众、带领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充分挖掘本大队潜力，采取各种措施，力求补回损失，夺回丰收，而只是简单地强调“丢”，那就从另一个极端，把全局和局部对立起来了。因为只有局部充分发挥本身的积极性、创造性，全局利益才能真正地得到保证。

经过多次修改的现在的演出本中的江水英，和李志田一样，是一个土生土长来自群众的农村干部。她关心和热爱“生我养我的龙江村”，但不是象李志田那样从本位主义出发，而是从党的全局利益出发，把它作为党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第二场一段“百花盛开春满园”的对唱，就抒发了她对本大队群众亲手开垦的高产良



田的深厚的阶级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和过去私有制下的个体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有天渊之别。江水英不但爱本大队的三百亩、三千亩，而且爱所有的人民公社的土地。“手心手背都是贫下中农的肉，山前山后都是人民公社的田”，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她对本大队的生产考虑得比谁都周密和细致，对社员的生活更是无微不至地关心和体贴。在坚决“丢卒保车”的同时，她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发动社员群众出主意、想办法，采取各种补救措施，并且妥善地安排社员的生活。我们为阿坚伯设计的一段驳斥常富的唱段——“这样的好书记人人夸不够”，把江水英和常富作了鲜明的对比，唱出了江水英如何带领群众苦战三千亩，抱病操劳夺丰收的动人事迹。这样一改，江水英的革命风格就有了深厚的内容和坚实的基础，她做掉队的战友的工作，就更有说服力。而李志田在事实面前醒悟过来，也更加合情合理。观众的感情也自然地倒向江水英的一边。

以主要英雄人物为中心，有区别有联系 有层次地组织戏剧冲突

《龙》剧以江、李的思想斗争为主线，在各种矛盾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江水英。在通盘构思戏剧冲突的时候，应该把刻画江水英这个主要英雄人物的形象放在首要的地位。江水英应当在舞台上占据中心位置。可是，究竟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明确的。《龙》剧的最初几稿，我们主观上也想突出江水英的英雄形象，实际效果却相反，占据舞台中心的不是江水英而是李志田。

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主要的问题在于，各种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李志田的身上。李志田跟江水英斗，跟阿坚伯斗，跟阿更闹矛盾，而富裕中农、阶级敌人都来找李志田，各种矛盾都汇集到他的面前。江水英却游离于矛盾冲突之外，或者处于被动的局面。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每一个回合都是江、李直接照面。李是一碰到问题就跳，而江则忙于跟着他做工作，实际上是被他牵着鼻子跑。正因为所有的人都围着李志田转，所以其他人物实际上不是在衬托江水英而是给李志田做铺垫。这样，占据舞台中心的当然是李志田而不是江水英。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作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修改：



首先，把各种矛盾都汇集到江水英的面前，由江水英积极、主动地发现矛盾和解决矛盾。剧中三条矛盾线索都以江水英为中心来展开：江、李斗争，是江水英发现了李志田的思想问题，提出开支委会，学习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统一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同时对症下药，言教身教，主动地深入细致地做李的思想工作。对敌斗争，是她警觉到黄国忠的可疑迹象，几次提醒李志田和阿更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但制止了黄的破坏活动，而且亲自调查研究，挖出了这个阶级敌人。富裕中农常富，则让他从江水英的种种先进事迹和英雄行为中得到教育。这样，在解决各种矛盾的斗争中，就自然地使江水英处于中心地位。

其次，对江、李斗争这条主线，我们采取时断时续的办法。江水英的对立面，不止是李志田一个人，无需在每一场都让江、李直接交锋。就本剧来说，把对立面散开，有利于突出江水英。例如《窑场斗争》一场，开始是阿莲和阿更冲突，这场冲突实际上正是江、李斗争的继续。接着江水英上场粉碎了黄国忠的阴谋，最后她通过小红和盼水妈送畚箕的动人事例，既教育了阿更，也教育了李志田。《出外支援》和《后山访旱》两场，都是重点刻画江水英的崇高风格的戏，李志田都没有出场。这样，每一个关键性场面都有江水英的戏，而江、李直接交锋实际上只有《丢卒保车》和《闸上风云》两场。就全剧来看，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没有中断，而江、李的斗争却是既有间隔，又有连接。戏剧矛盾也就有变化，有起伏，有高潮。李志田出场虽然减少了，但由于冲突的加强和思想的深化，戏却更集中了。

第三，其他人物都为江水英作反衬或铺垫。江水英和李志田是一种对比，江水英和常富是另一种对比。写黄国忠也是为了反衬江水英的高度的敌情观念和斗争精神。就其他英雄人物而言，阿坚伯跟常富的冲突，阿莲跟阿更的冲突，都是为江水英作铺垫的。写小红和盼水妈也是为了衬托江水英。有了她们的两场戏，就开拓了戏的境界，开阔了观众的视野，使大家更深一层地体会到江水英为保证堵江送水，在最困难的时候坚决停火搬柴，支援后山，进一步发扬“龙江风格”的深厚的阶级内容和深远的意义。盼水妈对这个龙江大队的带头人的热情赞赏，使观众十分亲切地感觉到江水英的英雄形象的高大。

由于以江水英为中心的矛盾冲突从三个方面展开，所以在组织矛盾冲突的时



候，必须注意各种矛盾的区别和联系。区别，就是不同性质不同特点的矛盾不能混淆。不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要严格区别开来，而且在人民内部，李志田、阿更同常富也要区别开来。所谓联系，就是说在同一出戏中的各种矛盾不能是互不相关的平行线，而应该有内在联系。

要有区别就是要注意分寸。李志田和阿更，主要是思想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的问题。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对集体事业的态度和常富是截然不同的。在常富来说，则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但是他和黄国忠又有严格的区别。

有区别的各类矛盾又是相互联系的。问题是如何写出这种联系。《龙》剧最初几稿，也写了敌我斗争这条线，但游离于主线之外，好象是硬贴上去的。后来我们重新研究生活素材，进一步认识到，抗旱的关键是水：一方送水，一方盼水，剧情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水。阶级敌人的破坏，也集中在水的问题上。我们把黄国忠处理为解放前霸水占田的地主帮凶，又为盼水妈设计了一段盼水、找水、争水到孩儿血染山岩的惨痛家史，这样就围绕水的问题把敌我斗争这条线和整个剧情有机地组合起来。从而也把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前山后山的关系联结起来。黄国忠企图利用人民内部矛盾来达到其反革命的目的，既煽动常富给他打头阵，又利用李志田和阿更的思想问题来煽风点火，施展阴谋。而后者的本位主义思想又恰恰成了阶级敌人和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的防空洞。我们力求通过这样的处理来写出两类矛盾的内在的规律性的联系。当然，这仅仅是根据《龙》剧的题材和主题的特点来处理的，而实际生活中阶级斗争的表现是多样的，变化的，不可能有一个处处适用的套子。不从实际生活出发而从套子出发，是写不好艺术作品的。

在处理各种矛盾冲突的时候，还必须注意矛盾发展的层次。

我们所说的层次，首先是指矛盾冲突发展的阶段性。堵江抗旱是一场艰巨的战斗。新的困难、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会层出不穷。本位主义的思想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解决。戏剧冲突的逻辑性应该反映生活的规律性。如果不加以集中概括和典型化，容易使全剧结构松散和重复。现在的演出本我们安排了五个重要的回合：“丢卒保车”——窑场斗争——抢险合龙——出外支援和后山访旱——闹上风云。一环紧扣一环，每一个回合的内容、特点都不一样，一个回合的解决都为下



一个新的回合奠定基础。

不但整个戏剧冲突的发展要有层次，而且每一条矛盾线索也要有层次地发展。例如敌我矛盾这条线，江水英对黄国忠由起疑，到觉察，到调查研究，到最后挖出这个阶级敌人，是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的。这样处理比较地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性。因为敌人总是要在斗争中逐步地暴露出来的；而英雄人物也不可能未卜先知，一见面就知道对方是阶级敌人。

不但每条矛盾线索要有层次，而且每场戏，特别是重点场次，也要有层次、有节奏。例如《闸上风云》一场，就有五个层次：黄国忠、常富煽动李志田是一层，阿坚伯和李志田冲突是一层，江水英上场说服李志田是一层，挖出黄国忠是一层，最后李志田转变又是一层。这样，一场戏也可以波澜起伏，避免平铺直叙。

层次还有另一方面的含义，那就是指人物布局的主次轻重。要有层次地处理对立面人物和他们的转变。例如李志田和阿更就不一样。地位不同，作用不同，转变也有先有后。英雄人物之间，也要层次分明。阿坚伯和阿莲，盼水妈和小红，都对江水英起着绿叶衬红花的作用，但角度不一样，戏也有轻有重，不能雷同。

为革命苦练基本功，不断提高革命现代戏的演出质量

一出革命现代戏，要有好的剧本，好的唱腔、音乐、舞台美术的设计，好的导演构思，最后还要有好的表演。表演艺术的问题，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工农兵英雄形象能不能在舞台上丰满地树立起来，从而使戏剧艺术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重要问题。我们在演出质量方面，和革命样板戏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艺术上进一步作出艰苦的努力，“对技术精益求精”，不断提高演出质量。

提高演出质量，首先必须认真向工农兵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同时，要刻苦锻炼为工农兵服务所必须掌握的艺术表现手段。世界观的改造是特别重要的。只有在生活中和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感情的差距缩小了，在舞台上和英雄人物的距离才会缩短。只有深入工农兵，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会解决从工农兵出发还是从自我出发这个根本问题。原先有的同志演英雄人物总觉得思想



上较空虚，缺少革命激情，有时还摆脱不了旧京剧“生、旦、净、丑、末”那一套。我们根据《讲话》所指引的方向，连续五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特别是和贫下中农中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同生活、同劳动、同战斗一段时期，许多同志精神面貌变了，演出质量也提高了。

在如何对待艺术基本功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思想的斗争。“练功无用论”和“练功吃亏论”就是我们碰到的两种思想障碍。

所谓“练功无用论”，就是说，演革命现代戏，基本功用不上了，或者说够用了，不用再练了。的确，旧京剧的那套基本功，有一些是应该废弃的。但是，也还有不少好的有用的东西，不能失传，应该根据“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方针加以批判继承和改造，使之为工农兵服务。毛主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例如，第五场的舞蹈设计，开始我们就不敢用“窜猫”、“旋子”这些动作。后来，经过一些同志的指点，这场戏吸取了京剧武功中一些有用的东西。我们用“旋子”来表现江水英和社员们在激流中英勇抢救战友，用“窜猫”来表现他们争先恐后冲向合龙口跳水的英勇行为，艺术效果就很好。事实证明，有些武功只要从生活出发，加以改造，是能够表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的。

“够用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旧的京剧基本功中有的要废弃，有的要改造，同时还要我们根据表现现代生活和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需要来丰富、发展和创造新的京剧表演艺术。例如，旧京剧旦角的唱和念，全用假嗓，讲究柔媚娇嫩，其实是矫揉造作。要塑造好江水英的英雄形象，在声乐上就必须革命。唱腔和念白，都要求根据人物性格和感情的节奏，用真假嗓相结合的方法，来表现江水英的革命精神和豪迈气概；做到以情带声，声情并茂。江水英的唱，有时要刚劲挺拔、豪放壮阔，有时要深沉细致，朴素亲切；还要刚柔并济，方圆结合。总之，应该充满革命的激情和富于时代和生活的气息。念白也要讲究节奏、韵律，加强其音乐性。这就要求演员掌握多种唱和念的方法，进行刻苦的多方面的锻炼。英雄人物的身段、台步、舞蹈等，都要求刚健、挺拔、开阔。旧京剧旦角那种所谓“笑不露齿、行不露足”的身段台步，不适用了。旧的京剧舞蹈语汇也远远不够用



了，必须从实际生活出发进行加工和提炼，同时从其他剧种和艺术形式（诸如芭蕾、武术等）中吸取有用的成分。象第五场表现江水英等用身体挡住激流的“弧形推浪”和“浪形起伏”两个舞蹈动作，就是根据水浪的特点和斗争的情景设计的。再如跳板的动作是从体育跳水的动作中得到启发的。

京剧艺术的改革，包括京剧基本功的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付出辛勤的劳动和艰苦的努力。对演员们说来，演革命现代戏，还要求文武结合，在唱、做、念、打各方面全面发展（当然可以根据演员本身的条件有所侧重）。

所谓“练功吃亏论”，提出了一个为谁练功的问题。有的人过去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练功十分卖劲，为什么现在演社会主义时代的工农兵及其英雄人物，反而感到“吃亏”了，没有劲了？主要问题就在于没有解决为谁服务这个根本的问题。只有真正树立起为革命、为工农兵而自觉练功的思想，才会有一股子无产阶级的牛劲，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和机会来苦练基本功。同志们在下乡的过程中，和贫下中农一比较，觉得贫下中农不怕艰苦，坚持劳动，为革命种田，为什么自己不能在同样的条件下为革命练功？于是大家把打谷场变成练功场，把稻草当作垫子，练出了新成绩，打破了“下乡不能练功”的框框。

要抓好练功，关键还在于加强领导。领导一定要重视和关心练功，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贯彻和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高度来认识。要在练功的时间、条件、安全保护等方面采取切实的措施，并且要深入现场和演员一道总结经验。我们在剧组领导小组下面设立了练功指导小组，在具体做法上力求做到五个结合和三个落实：五个结合是文功武功结合，练基本功和排戏结合，个人练功和集体练功结合，一般与重点（即对有的同志作重点辅导）结合，训练与研究结合。三个落实是指时间、地点、辅导员的落实。在演出任务较重的时候，我们也力求以任务带动练功。

《龙》剧的创作过程充分证明：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就是胜利。展望社会主义艺术的无限美好的前景，我们更加信心百倍。我们一定要永远沿着《讲话》所指引的方向，一辈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为表现工农兵，歌颂工农兵，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作出更大的努力，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经常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云南冶金第一矿的调查报告

内容提要：这个矿在实践中体会到，要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关键在于有一支具有高度路线觉悟的工人阶级队伍。因此，他们特别注意经常对工人群众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并根据老工人和新工人的不同特点和问题进行思想工作，不断提高工人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

云南冶金第一矿党委和革委会，最近两年来，注意把对干部和工人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办企业路线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工人和干部的路线觉悟，使企业连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矿山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对于经常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重要性，他们是在斗争实践中逐步认识的。

一九七〇年上半年，这个矿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的过程中，曾注意对广大干部和工人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但是，当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有的干部就认为：阶级斗争搞得差不多了，基本路线也学得差不多了，可以歇口气了。由于放松了阶级斗争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有些单位无政府主义抬头，革命和生产都受到影响。

矿革委会领导成员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过程中，有两个单位阶级斗争的现实和进行基本路线教育的实践给他们很大启示。一个是胜利坑掘进十五队。这个队原来是矿的先进集体，革命和生产都搞得比较好。但在胜利的形势下，有的干部产生了“歇歇再走”的和平麻痹思想，对阶级敌人放松了警惕。一个反革命分子乘机煽动青年工人不安心矿山工作，使这个队两个月没有完成生产任务。后来，他们抓紧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揭露和批判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生产又很快出现新的高潮。另一个是冶炼厂的一个车间，过去由于阶级斗争抓得不力，生产一直上不去，是一个后进车间。车间党支部成立后，总结了前一段不抓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向干部和工人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发动群众批判一个反革命分子对干部进行腐蚀拉拢、对青工灌输资产阶级思想等罪行，提高了大家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使革命和生产出现了新的面貌，转变成为全厂的先进集体。这两个单位的实践使这个矿的领导和群众进一步认识到：在社会主义企业里，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毛主席指



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经常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只有始终抓紧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用阶级斗争去带动生产斗争，才能使企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这个矿的领导从基本路线教育的实践中体会到，要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必须把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同贯彻执行党的办企业路线结合起来。

他们在总结基本路线教育的经验时，发现有的单位结合对敌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里反腐蚀的斗争进行基本路线教育，抓得比较紧，也比较自觉；而对于如何结合贯彻党的办企业路线来进行基本路线教育，则认识不够明确。因此，在贯彻执行党的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的时候，往往出现左右摇摆。针对这种情况，他们组织干部和工人联系实际，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通过学习，大家认识到：在怎样办企业的问题上，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党的办企业的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都是从属于党的基本路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就是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只有牢牢掌握党的基本路线，才能保证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

这个矿的领导经常注意引导干部和工人用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生产领域里存在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种种表现，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办企业路线，什么是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

由于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干扰、破坏，这个矿的有些同志，在政治与业务关系的问题上，曾经存在一些糊涂思想，分不清“抓革命，促生产”与“生产第一”的界限。有的人认为，“办企业，只要把生产搞上去就万事大吉”，只抓生产，忽视政治；也有的人认为，“抓政治是方向，抓生产是转向”，管生产的不抓社会主义的企业管，搞技术的不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而学技术。有一个单位的领导成员，去年为了更好地完成国家计划，对车间提出了增产指标。事后，有的人说这是“只讲生产，不讲政治，大方向错了。”矿党委抓住这个问题，发动群众用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具体分析，并联系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各种谬论，开展革命大批判，使大家认识到：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抓阶级斗争，是党的办企业路线的灵魂；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抓阶级斗争，是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本质。在处理政治与业务关系问题上“左”的和右的两种倾向，虽然表现的形式不同，但实质上都是否定生产领域里的阶



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政治对生产的统帅作用，都是同毛主席批示的“鞍钢宪法”对立的。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的统一。在阶级社会里，生产、技术和管理，都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问题不在于抓不抓生产、搞不搞管理，而在于为那一个阶级、用什么路线去抓去管。由于通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划清了界限，排除了“左”、右干扰，使党的办企业路线在这个矿不断得到落实。

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时，他们还经常注意引导干部和工人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出发，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总的目标着眼，来看待、处理办企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高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

有一个分矿，为了扩大生产，决定新建一项工程。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个分矿好久没有搞什么新的建设了，现在有条件，要建就要象个样子，提出了一个投资六百万元和三年建成的方案；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自力更生，勤俭节约，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矿党委认识到，这个争论不是一般问题，而是关系到执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他们组织干部和工人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使大家认识到：自力更生，勤俭节约，把建设搞得尽可能多一些、快一些、好一些、省一些，这是同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支援世界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是由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一客观事实所决定的，是一个长期的方针。那种一搞建设，就向上伸手，追求“大、洋、全”的作法，是和党的基本路线背道而驰的。通过一场辩论，他们很快统一了思想，坚决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依靠群众，自己动手，挖掘内部潜力。结果，只花了一百七十多万元的投资，十个月就建成投产。近几年来，这个矿的生产能力有很大增加，大部分是依靠自力更生、挖掘潜力得来的。

矿的领导通过实践还认识到，要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关键在于有一支具有高度路线觉悟的工人阶级队伍。因此，他们特别注意经常对工人群众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这个矿是个老企业，老工人多，基层干部有百分之八十左右是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新工人大部分是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在一段时间里，有些干部认为这些老工人“苦大仇深觉悟高”，青年工人“思想单纯进步快”，出不了什么问题，因而忽视了对工人群众进行路线教育。矿党委认为这些思想虽然是少数同志反映出来的，但却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工人阶级要不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路线觉悟，以便更好地发挥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于是，他们组织干部和工人群众联系阶级斗争的实际，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等教导，使大家认识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但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通过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和不断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得来的。社会上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工人阶级内部也存在无产阶级思想



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才能掌握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客观规律，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才能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自觉战斗。

为了不断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这个矿针对老工人和青年工人的不同特点和问题，经常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有些老工人往往满足于朴素的阶级感情，认为自己是苦水里泡大的，一辈子也栽不了跟头；有的有满足现状、“歇口气”的思想。针对这些问题，这个矿经常组织老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进行新旧社会的对比和矿山建设中两条路线的对比，揭发、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帮助他们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把朴素的阶级感情提高到路线斗争觉悟的高度。一些青年工人由于长在新社会，没吃过旧社会的苦，往往容易产生“自来红”的思想，怕苦、怕累，不安心矿山工作。对他们主要是联系现实阶级斗争进行路线教育，特别是依靠老工人进行忆苦思甜，来提高他们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如掘进四队有个青年工人，刚到矿山时，嫌工作苦，不安心。一天，他跟着老工人打坑道时，发现了一个解放前资本家残酷剥削压榨工人的小矿棚。老工人就抓住机会对他进行回忆对比教育，边带他钻洞，边回忆旧社会的苦难生活。从此以后，这个青年工人处处向老工人学习，决心接好革命班，积极投入了大打矿山之仗的战斗。老工人在对青年工人进行教育的同时，也教育了自己。他们说：越回忆对比，越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决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要用千年苦水洗刷头脑中的“和平锈”，努力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为了把基本路线教育不断引向深入，这个矿总结推广了掘进四队基本路线教育经常抓，“身在矿井看天下”，不断为革命攀登掘进高峰的经验；总结推广了三分矿以老工人为骨干，办起“矿山忆苦站”，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不断提高老工人继续革命的觉悟和教育青年工人接好革命班的经验；总结推广了冶炼厂一个车间进行基本路线教育，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变后进为先进的经验。由于推广了这些经验，进一步提高了全矿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自觉性，加强了工人阶级队伍的思想建设，有力地推动了矿山建设。不少掘进队生产大幅度增长。全矿生产的金属品种由几种增加到十几种，综合利用的产品产量超过了主产品产量。

云南冶金第一矿党委深切地感到，同先进单位相比，他们工作还有很大差距，对于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方面已经取得的经验，也还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他们决心把基本路线教育继续抓紧抓细，长期坚持下去，不断克服工作中的缺点，以大庆为榜样，把社会主义企业办得更好。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对技术人员进行路线教育的一些经验

——吉林热电厂的调查报告

内容提要：这篇调查报告是讲对技术人员进行路线教育的重要性和做法。这个厂针对技术人员在工作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在进行路线教育时，引导他们划清几个带普遍性的思想界限，提高了技术人员的路线觉悟，并注意区别不同情况做过细的思想工作，进一步调动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毛主席指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吉林热电厂党委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坚持对技术人员进行路线教育，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帮助他们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使他们在革命和生产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两年多来，这个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一起，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搞技术革新，改造了六台汽轮发电机和八台锅炉，使发电、供热能力比原设计分别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三和二十五，相当于为国家增建了一座中型热电厂。一九七〇年这个厂的产值、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等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一九七一年提前全面完成了国家计划。

对技术人员进行路线教育的重要性

吉林热电厂是一个高温高压的近代化工厂，技术人员比较多，在两千五百多名职工中，技术人员就有四百三十五名，占百分之十七以上，其中除少数是解放前的旧知识分子外，大多数是解放后培养出来的学生。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不是要继续抓紧对他们进行路线教育呢？厂党委有的同志对这个问题曾存在糊涂认识，他们认为对技术人员现在主要是合理安排和使用的问题，因此，在工作中就忽视了对他们继续进行路线教育。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厂党委召开了座谈会，对技术人员的思想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有一些技术人员在思想深处对技术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错误的看法。一种是认为“技术工作危险”，操心费力担责任；另一种是认为“技术至上”，“要搞好生产还得靠我们”，把自己摆在不适当的位置上。汽轮机分场有个技术人员，设想了一个检修汽轮机低压加热器时不减少发电量的改革方案，但是他怕担责任，想改又不敢改；化学分场有个技术员，提出自力更生解决供水能力不足的问题，并主动承担了试验任务，可是试验时却只领了几个试验员关起门来搞，碰到了问题就失去信心，走了弯路；还有一个负责设备检修的工程师，在审批要用一种新技术改造发电机的请示报告时，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现实的，需要大量投资，又要停产很长时间，但他怕犯压制群众积极性的错误，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为什么领导大胆放手让技术人员抓工作，有的还不敢干？为什么有的技术人员虽然革命热情高，但干起来却不走群众路线？为什么有的技术人员对错误意见不抵制，正确意见不坚持？这说明他们头脑中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还需要继续改造世界观。正是这些思想上的矛盾使他们放不开手脚，辨不清是非，坚持不了原则，不能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充分发挥作用。

广大技术人员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路线觉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他们头脑中的旧思想是长期形成的，不可能经过一两次运动就能解决。“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因此，对技术人员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路线教育，帮助他们分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什么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什么是辩证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路线斗争觉悟，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只抓使用不抓教育，从形式上看对知识分子很信任、很重视，实际上是放弃了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并不能真正发挥技术人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吉林热电厂党委提高了认识，就把对技术人员进行路线教育纳入议事日程，当做一件大事来抓。党委有专人负责，经常分析技术人员的思想状况，提出路线教育的课题，使路线教育不断深入。党委注意教育工人群众认识对技术人员进行再教育是自己应尽的政治责任，从而满腔热情地帮助技术人员改造旧思想，在他们有了成绩的时候，帮助他们从路线上总结经验，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加深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认识；有了错误，就帮助他们从路线上吸取教训，分清是非，明确前进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注意抓住典型事例进行教育，把一个人的经验教训变成大家的认识，不断提高技术人员接受再教育的自觉性。

坚持在使用中进行路线教育

吉林热电厂党委对技术人员进行路线教育的一个主要做法是，坚持在使用中进行教育，



让技术人员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同工人和干部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搞技术革新，一起批判资产阶级。既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又使他们受到实际的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

这个厂的总工程师，过去受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不关心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做了一些束缚工人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事。这个问题他是在实践中逐步加深认识的。有一次，他参加检修钢球磨煤机，按照他过去搞的规定，磨煤机里的四十多块衬瓦要编上号，安装时“对号入座”，位置不能弄错。这次他亲自参加检修，发现衬瓦的规格都是一样的，放到哪个位置上都行，根本用不着编号。他想，一块衬瓦八十多斤重，按照自己过去搞的规定去办，工人们要白白地付出多少劳动啊！为什么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还规定错了呢？他在工人群众的帮助下，从思想上找到了原因，认识到主要是执行的路线不对，脱离实际，缺乏无产阶级感情。技术管理工作不单是个技术问题，而是和路线紧密联系着的，只有执行正确路线，才能使技术工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从这以后，他努力提高路线觉悟，经常深入生产第一线，了解实际情况，在工人群众的帮助下，积极发挥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为了提高技术人员的路线觉悟，这个厂党委注意针对技术人员在工作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引导他们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帮助他们划清几个带有普遍性的思想界限，分清路线是非。

一是划清技术人员参加企业管理同“专家治厂”的界限。有的技术人员参加厂或分场的管理工作以后，存在一种顾虑，怕说是“专家治厂”，不敢大胆负责。汽机分场有一名技术员就是这样。开始，他积极参加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热情地给新工人讲生产技术。后来，他听到有人说这是“专家治厂”，情绪就低落了，原来打算搞的一项技术革新也撂下了。厂党委发现这个问题，就组织技术人员学习毛主席批示的“鞍钢宪法”，批判“专家治厂”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使他们认识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技术人员参加企业管理，同“专家治厂”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回事。“专家治厂”是否认党的领导，反对工人群众参加管理，只依靠少数技术权威，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而在党的领导下，技术人员参加生产管理，和工人密切合作，发挥技术专长，实行“三结合”，这是在企业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经过路线教育，这个厂的技术人员分清了是非，积极参加企业管理，大胆工作，认真负责。汽机分场的那个技术员提高认识以后，不仅积极参加技术革新，把原来撂下的革新项目搞成了，还经常到班组和宿舍给工人讲技术课，抓技术培训工作。

二是划清为革命钻研技术同“技术第一”的界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厂党委多次组织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开展革命大批判，使大家认识到，在对待技术的问题上，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要坚定不移地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就要认真改造世界观。在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刻苦钻研技术，对技术精益求精，努力掌握社会主义企业中技术管理工作的客观规律，是符合党和革命事业需要的。只有那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搞技术至上，把技术作为成名成家的资本，才是“技术第一”，才是必须坚决反对的。由于划清了为革命钻研技术和“技术第一”的界限，就调动了广大技术人员为革命钻研技术的积极性。锅炉分场有个技术员，为了解决锅炉风量不足的问题，一面查阅技术资料，一面和工人群众一起研究，集中群众的实践经验，突破了技术难关，改革了风机和通风管道，提高了锅炉的供汽能力。

三是划清尊重科学与“洋奴哲学”的界限。这个厂有一套进口设备，有人提出这套设备里减温器的法兰结合面容易漏泄，是个“洋脑袋”，应该砍掉，改成焊接的。有一个技术干部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认为只要注意法兰面的检修工艺，漏泄是可以防止的。如果把法兰割掉焊死，虽然可以不漏，但检修内部装置时，拆卸有困难，而且把可用的法兰割掉，还会给国家造成浪费。这本来是个正确的意见，但他怕别人说自己有崇洋思想，没敢坚持。厂领导抓住这件事，对技术人员进行了教育，使大家认识到，对外国的东西盲目崇拜，不分好坏，照抄照搬，让洋教条牵着鼻子走，是“洋奴哲学”。遵照毛主席关于“洋为中用”的指示，对外国的东西做具体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取外国的先进经验，让它为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服务，这是尊重科学的态度，是正确的。这个厂的技术人员由于划清了这个界限，在技术革新中，就能够从实际出发，既借鉴外国的经验，又敢于创新。

吉林热电厂党委从实践中体会到：对技术人员在使用中进行路线教育，就是在实践中教育，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教育。这样进行教育，矛盾暴露得充分，问题抓得准，针对性强；能够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统一起来，使技术人员从实践中切身感到自己的思想不适应要求，增强接受再教育的自觉性；便于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结合，接受工人群众的再教育，学习工人群众鲜明的阶级立场和路线斗争觉悟。

区别不同情况 做过细的工作



吉林热电厂在对技术人员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中，还注意区别不同的情况，做过细的工作，帮助他们逐步地改变旧思想。

有的家庭出身比较好的技术人员，有一种优越感，对自己政治上要求不严，思想改造抓得不紧，钻研技术的劲头也不足。这主要是他们把自己摆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之外，看不到旧思想对自己的影响。为了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厂党委通过分析一个出身比较好的技术员，由于不注意思想改造犯了错误的教训，使大家认识到，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就必然去占领。这个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每



个人。出身好，有朴素的阶级感情，是接受无产阶级思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有利条件，但是，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思想改造，不努力提高自己的路线觉悟，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就抵制不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提高认识后，许多出身比较好的技术人员，坚持对自己的思想作阶级分析，在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努力改造世界观。

有的技术人员背着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工作缩手缩脚。厂党委具体分析了这些人的思想状况，认为他们虽然看到了剥削阶级家庭对自己的影响，但是又缺乏同旧思想彻底决裂的勇气。于是，一方面引导他们学习党的路线和政策，使他们认识到，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是个人执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却决定于自己。要跟毛主席革命到底，就必须肃清剥削阶级家庭对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积极鼓励他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在实践中加深对党的政策的理解。电气分场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技术员，在挖掘发电机生产潜力的技术革新中，提出一个改革方案，但在改革中失败了，影响了生产。这件事对他压力很大。工厂和分场的领导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这项革新的失败是属于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没有完全掌握而造成的，就找他谈心，帮助他总结失败的教训，鼓励他继续试验。事实使他加深了对党的政策的理解，感到党的温暖，进一步增强了继续革命的信心和勇气。以后，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劳动，大胆进行技术革新，取得了新的成绩。

这个厂党委还注意对一些老的技术人员进行路线教育，帮助他们接受新事物，做出新贡献。在改革发电机的过程中，工人建议在发电机轴头上装一台小风扇，使发电机降温，提高发电能力。负责改革的一位在厂工作二十多年的技术干部，没有接受工人的意见。要不要装小风扇？厂领导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认为工人提出的建议是可行的，就决定进行改革，并让这个技术干部亲自参加，经过反复实验，终于把小风扇安装在发电机的轴头上。厂领导抓住这件事帮助这位技术干部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认识。他对照工人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检查了自己的思想，认识到，开始对工人群众的建议没有认真分析，就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暴露了自己不尊重群众意见，自恃高明的资产阶级思想，这种旧思想不克服，就不能接受新事物，就不能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践使厂党委体会到，帮助一些老的技术人员转变旧思想，需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要用事实教育他们，同时注意不要把他们丰富的经验看成是经验主义，不要把他们考虑问题慎重看成是思想保守。

吉林热电厂党委在对技术人员进行路线教育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他们感到，工作中还存在缺点和问题，怎样重点抓住基本路线的教育，把路线教育和看书学习更好地结合起来，等等，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解决。

吉林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读一点有关帝国主义的历史

——三谈读一点世界史

史 军

学习历史，要从正面和反面吸取对我们有益的历史经验，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现实的阶级斗争。我们在读世界史的过程中，读一点有关帝国主义的历史，了解帝国主义从发展到没落的过程，了解帝国主义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本质和特点，了解帝国主义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和策略，掌握帝国主义的客观规律，这对于提高我们的政治思想水平，指导我们的革命斗争实践，都是有意义的。

伟大的列宁亲自参加了帝国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了自马克思的《资本论》发表以后半个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新发展，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光辉著作，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规律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作了深刻的论述。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在领导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长期斗争的革命实践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写了《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著名论断，对当代世界形势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作了一系列深刻的分析。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著，是我们研究帝国主义历史的理论指南。

什么是帝国主义呢？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可分三方面来谈：（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历史告诉我们，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是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中，由于资本不断积聚，生产不断集中，因而导致垄断，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



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继续，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从世界范围来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当时在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美、德、法、俄等国，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正如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由于当时欧美一些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它们各自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十九世纪的英国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帝国主义”，它通过击溃早期“海上霸王”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和先后打败海上劲敌荷兰和法国，并发动一系列掠夺海外殖民地的战争，到十九世纪末，建立了一个殖民地面积等于本国领土一百多倍的殖民大帝国。主要靠剥削殖民地人民血汗过活的英帝国，突出地表现了帝国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美国是一个后起的、暴发的帝国主义，极力进行扩张和侵略。美国垄断资本家在一八九八年发动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美国和日本战争，把波多黎各、菲律宾、古巴变为它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又大发战争横财。它直接参加妄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揭开了血腥的帝国主义的血腥史上特别悲惨的一页”。（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沙俄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在那里，垄断资本主义同经济和政治上的农奴制残余结合在一起，形成最反动最野蛮的国家制度——沙皇专制统治，成为俄国各民族的监狱。它不仅充当欧洲宪兵，而且是亚洲的宪兵，正象列宁说的：“俄国一直牢固地保持了世界宪兵的荣誉”。（《评沙皇的欧洲之行和黑帮杜马某些代表的英国之行》）

尽管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这个基础上，一小撮金融寡头操纵国家政权，控制经济命脉。保证垄断资本的高额垄断利润是帝国主义一切活动的根本目的。掠夺是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暴力和掠夺，没有侵略和扩张，帝国主义就活不下去。任何帝国主义，不论是资本帝国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它既然是帝国主义，就必然都要受帝国主义规律的支配，实行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走帝国主义腐朽没落的道路。



列宁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是由于垄断资本的统治不仅不能消灭竞争，而是使垄断和竞争结合在一起，各国的垄断组织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更为严重。同时在科学技术不断革新的情况下，一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利用新的科学技术成果以及其他条件，赶上或超过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而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则因其垄断统治所固有的腐朽性和寄生性特别突出，迅速地走向衰微破败。十九世纪上半期的英国，号称“世界工场”，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的煤、铁、布匹生产比美、德、法三国产量总和还要多。但是十年之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超过英国，占世界工业生产第一位。二十世纪初，德国也超过英国占世界第二位。正是在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支配下，帝国主义国家此起彼落，你消我长，总是不平衡地发展，因而导致不断地进行争夺霸权的尖锐斗争。按“资本”和“实力”重新瓜分世界，是帝国主义的必然规律。

为了争霸世界，重新瓜分殖民地，帝国主义总是把大力扩充海军，争夺海上霸权作为他们扩军备战的一项重要决策。十九世纪的英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海上霸王”，它奉行海军“双强标准”（即它的海军实力必须等于两个较次海上强国联合起来的实力），推行炮舰政策。德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不满足于吃点英、法帝国主义饱餐后的残羹，叫嚷：“我们的未来在海上”，“让别的国家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满足于蓝色的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也要求日光下的地盘”，因而开始建立强大的舰队。面对德国的挑战，英国为了保持海上霸权，马上投入建造新型的巨大装甲舰“无畏舰”的工程。一九〇六年英国第一艘“无畏舰”下水，用以炫耀其海军威力。但是德国不甘示弱，也立即动手建造“无畏舰”。到一九〇八年，英国建成十二艘，而德国已拥有九艘。英、德两国为了争夺海上霸权，先后几次讨论双方限制海上军备问题。英国要求德国在承认英国海上优势的条件下限制海上军备，而德国并不买账，继续进行军备竞赛。于是英国政府决定：德国造一艘大军舰，英国就造两艘。这样，英、德两国口头上大谈裁军，实际上大搞扩军，双方一直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英国由于经济和军事力量在战争中遭到削弱，无可奈何地从昔日的“双强标准”下降为“一强



标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特别是殖民地人民纷纷觉醒，大英帝国急剧地衰落下去，当年的“日不落”的“海上霸王”，如今已经是“日薄西山”了。

看看“海上霸王”英国的兴衰史，再来看看今天世界上运用炮舰政策，推行新殖民主义，通过相互勾结和争夺，妄图继续称霸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就可知道它们正在步老牌帝国主义的后尘。但是，今天时代已经变了，帝国主义在海洋上称王称霸不受惩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拉丁美洲国家和人民带头兴起的捍卫二百哩领海权、保护海洋资源的英勇斗争，就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代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帝国主义的国际关系史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从来没有而且不会有什么平衡，什么谐和，什么匀称**”。（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的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强盗们召开了分赃的“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形成了重新分割世界的所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虽然，在共同宰割战败国、瓜分弱小民族和反对人民革命中，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暂时勾结了起来，但是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却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争夺。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帝国主义的联盟是强盗的联盟，而强盗是无法团结起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不仅没有消除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反而由于掠夺性的和约和分赃不均，加深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它们总是极力要“**削弱敌方，摧毁敌方的霸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美、日都想争夺霸权。法国想彻底摧垮德国，甚至肢解德国，重建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而英国玩弄“均衡”策略，指望保持德、法之间的对抗，以继续维持自己在欧洲和世界的霸权，因此它不愿过分削弱德国，更不愿法国强大。美国则想凭借它的经济实力在争霸世界中占优势地位，因而遭到英、日等国的反对。日本在大战期间和战后大力向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也与英、美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它们矛盾重重，互相厮杀，都想吃掉对方，吃不掉的时候就用各种办法削弱和牵制对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竭力扶植德国，促使其经济和军事力量恢复，以此对抗英、法和反对当时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仅仅十几年，德国的钢铁产量就超过英、法两国产量的总和。由于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上台



及其疯狂推行侵略政策，德国再一次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策源地。在远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业、军事力量也猛烈增长，它的棉织品和其他轻工业品在亚洲市场上到处排挤英、美两国。经济扩张必然导致军事扩张。经济力量已经高速膨胀的德、日两个法西斯帝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力图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重新瓜分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仅仅二十年，帝国主义又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失败了，英、法严重削弱了，唯独美帝国主义在战争期间本土没有遭受战争破坏，反而由于战争的刺激，经济力量进一步增长。战后，美帝国主义代替了德、日帝国主义的地位，爬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地位。它的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二分之一，出口贸易占三分之一，黄金储备占四分之三。它一手挥舞着核武器，一手拿着美元，两手并用，为非作歹。它不但企图奴役亚、非、拉各国人民，“**甚至对它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国，也实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力图把它们踩在自己的脚下**”。（毛主席关于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曾经狂妄宣称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美国要“永久繁荣”下去。当美帝国主义还在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明确指出：“**美国的战争景气，仅仅是一时的现象。它的强大，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国内国外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就象一座火山，每天都在威胁美国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就是坐在这座火山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充分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预见。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消灭了美帝走狗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把美帝国主义的势力赶出了中国大陆。五十年代初，英雄的朝鲜人民打败了美国侵略者，戳穿了美帝这个纸老虎。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风起云涌，使美帝不断地受到猛烈的冲击。从此美帝就江河日下，从它的“高峰”上跌落下来。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英勇战斗，严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大大加速了美帝衰落的过程。靠战争膨胀起来的美国经济也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战后二十多年来，美国已经爆发了五次经济危机，这些危机大都与财政金融危机、美元危机交织在一起，持续很久，情况严重，至今尚未摆脱。昔日的“金元帝国”，今天美元贬值，黄金滚滚外流，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地位急剧下降，一九四八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工业生产所占比重为百分之五十三点四，到一九七〇年，则



下降到百分之四十一.三。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六九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由百分之三十二.四下降到百分之十六。美帝国主义关于“永久繁荣”的梦想，成了历史的笑柄。在美国国内，工人、黑人、青年、妇女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和反对侵略战争的运动蓬勃发展，严重地震撼着美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

帝国主义对内对外疯狂掠夺的历史过程，帝国主义之间互相争夺、互相厮杀的历史过程，以及帝国主义一个个衰落的历史过程，都雄辩地证明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的科学结论。资本主义的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的决然兴盛，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历史规律决定的。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寄生性充分地暴露出来，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大大激化了。正如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所分析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正是这些矛盾的发展和斗争，为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造成了必要的前提。列宁正是从对帝国主义发展规律的研究中，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由于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世界帝国主义战线将在它们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历史完全证实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科学预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俄国是当时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一九一七年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亚洲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革命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新证实。

帝国主义的历史又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愈是接近死亡，它愈要采取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种种手段，进行垂死挣扎。“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当年的希特勒法西斯德国为了摆脱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挽救其垂死的命运，对内疯狂镇压革命人民，实行法西



斯专政，在“大炮代替黄油”的反动口号下，对本国人民实行最大限度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对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野蛮地掠夺其他国家的人民。但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法西斯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空前规模的反法西斯斗争，使妄图成为“千年帝国”的希特勒德国只有十二年光景就彻底垮台了。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今天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到处进行侵略、颠覆、控制和干涉，这都是帝国主义垂死挣扎的表现。它们已经和正在激起全世界人民和广大中小国家如火如荼的反对两霸的正义斗争。正是在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帝国主义将逐步削弱，走向灭亡。

值得注意的是，帝国主义在进行垂死挣扎的过程中，总是把培植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作为它的一个基本政策。帝国主义者由于享有高额垄断利润，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工人上层，培植机会主义。新老修正主义者是垄断资本家用高额垄断利润收买的工贼，是完全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贵族，他们都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们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和本质，竭力美化帝国主义，传播帝国主义的思想，麻痹世界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起着帝国主义本身所不能起到的反动作用。列宁把这些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无产阶级叛徒称为“‘社会帝国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谆谆告诫我们，必须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密切地结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苏修领导集团的言行完全象列宁说的那样，口头上讲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实际上奉行的是以扩张、掠夺为目的的帝国主义政策，千方百计地争夺势力范围，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社会帝国主义者。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革命蓬勃发展，帝国主义进一步变换策略，在对没有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大力腐蚀、渗透的同时，对已经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又大搞颠覆活动和“和平演变”；在进行军事冒险，或武装入侵的同时，施行政治欺骗，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或者收买内奸，扶植傀儡，实行间接殖民统治；或者打着“军事援助”、“经济援助”的幌子，大搞资本输出，大搞商品倾销，使受“援”



国家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军事上受控制；或者利用签订所谓双边“友好条约”，企图把别国变成自己的附属国和殖民地；总之，帝国主义为了称霸世界，奴役别人，维持统治，其阴谋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但是，不管帝国主义玩弄什么新花招，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它们每侵略一个地方，就是把一条新的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作恶越多，绞索就拉得越紧。帝国主义的种种倒行逆施，只能加速它的灭亡，而不是得到挽救。

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和现状，总结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长期斗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光辉的战略和策略思想。毛主席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这个时代中，帝国主义“**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说：“**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毛主席的这个科学论断，是我们战胜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帝国主义是垂死的但还没有死亡的资本主义。这个反动东西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还有两重性。不可能设想，世界人民不经过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就能在一个早上把帝国主义消灭干净。但是只要全世界人民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长期坚持，百折不挠，帝国主义的必然灭亡，人民革命的必然胜利，都是毫无疑问的。今天，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为了一个一个地夺取革命的胜利，世界各国人民还将经历曲折的艰巨的斗争。“**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我们革命的人们，注意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学习，注意研究帝国主义的历史，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清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掌握其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正确观察当代各种复杂的国际斗争，增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心，促使我们更加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总结经验 执行政策

进一步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

朱 郁

在毛主席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伟大号召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改变了旧中国体育落后的状况，取得了很大成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体育战线上，通过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入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的修正主义体育路线，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体育路线进一步得到贯彻执行。广大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认真读马、列的书，认真读毛主席的书，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不断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群众体育普及的基础上，运动技术水平迅速提高。在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亚非乒乓球邀请赛以及其他国际体育交往中，我国运动员贯彻执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为建立和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当前国内外发展着的革命形势，对体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各级领导要更加重视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发展，要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示，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把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重视体育，从各个方面深刻地阐明了体育的重要性，为我国体育事业制定了唯一正确的路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对发展



体育事业作过许多重要指示，号召解放区军民参加体育锻炼。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毛主席又指出“**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号召全国人民：“**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毛主席把体育看作是无产阶级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之一，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毛主席又号召大办民兵师，指出“**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执行毛主席这些指示的经验告诉我们：搞好社会主义的体育活动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它的作用决不止于体育活动本身，而且对各条战线发生着政治上的思想上的影响。

社会主义体育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是加强战备的需要。同时，它又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从根本上说，体育工作做得好坏，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发展的问題，是关系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能否全面贯彻执行的问題。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社会主义体育的重要性，决不能把它看作可有可无、抓不抓无关紧要的事。

大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我国社会主义体育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体育和资本主义体育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是多数人搞还是少数人搞，是为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无产阶级认为，体育应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有，为增强人民体质、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服务。资产阶级则把体育当作少数剥削者所专有，作为他们养生保命、寻欢作乐和榨取利润的手段，为维护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服务。两种不同的体育观，代表着两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在我们党内，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体育路线同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体育路线的斗争也着重表现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反对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



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根本方向，反对群众体育，把广大工农兵排斥在体育运动之外。他们妄图把社会主义体育变为单纯消遣的资产阶级体育，剥夺广大工农兵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他们也不注意从广大群众中积极选拔优秀的代表，充实体育队伍。我们要批判这种反动观点，肃清其流毒。要充分认识到，只有大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使广大工农兵群众都参加体育锻炼，才能促进人民身体健康，使体育真正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要善于从本质上去发现群众对开展社会主义体育运动的积极性。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立，社会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群众生活的不断提高，为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创造了良好条件。广大工农兵群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为革命锻炼身体的迫切要求，有参加各种体育活动的高度热情和积极性。而体育运动的发展，反过来又必然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因为持久地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对增强人民体质，提高群众的健康水平，培养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加强组织纪律性和集体主义精神，有着积极的作用。它使人民群众精力更加充沛，革命干劲更加充足，革命毅力更加坚强，能够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发挥更大的力量。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人是最宝贵的。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首先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同时又要使人民群众有健康的身体。而要有健康的身体，就要进行体育锻炼。有的同志说：“工人农民天天参加生产劳动，还要搞什么体育锻炼？”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劳动对身体可以起到很大的锻炼作用，但由于专业分工的不同，它往往局限于对身体的某些部分的锻炼，而体育则能起到全面锻炼的作用。因此，生产劳动需要与体育相结合，由体育锻炼来加以调剂和补充。在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中，要充分重视发动青少年和干部参加体育锻炼。这样可以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增强干部的体质，提高他们的学习和工作效率。如果我们忽视调动广大群众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那就会影响他们健康水平的提高，从长远的观点看，也会影响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有些同志担心开展体育运动会妨碍生产，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从内部的必然联系来认识体育和生产的辩证关系。实践证明，凡是社会主义体育活动开展得好的地方，体育对生产都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广东省红工煤矿第三矿区，近两年多来有百分之八十的职工经常参加各项体育活动，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有些体弱多病的熟练工人，经过开展体育锻炼，结合药物治疗，恢复了健康，重返生产第一线。体育活动开展最好的建井队，创造了岩巷独头掘进月进三〇五点二米的全省最高纪录。可见，开展社会主义体育活动不是妨碍生产，而是促进生产。广大工农兵群众体育活动的实践，创造了不少正确处理体育和生产的关系的经验，只要我们总结和推广这些经验，就可以使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健康地发展。

毛主席谈到文艺工作时说过：“**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我们在体育工作中，同样必须执行这个方针。体育战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优秀的代表队和运动员都是从广泛的人民群众的体育活动中涌现出来的。把开展体育运动仅仅看作是少数人的事，不仅妨碍普及，也不利于提高。毛主席还指出：“**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体育的普及和提高，也必须是向工农兵普及，从工农兵提高。只有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参加体育活动，使体育在亿万工农兵中普及，才能不断涌现大批新生力量，提高才有深厚的基础。如果忽视群众体育工作，那代表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提高就成了空中楼阁。在这方面，不少地方是有深切体会的。一九五八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广东省广大工农兵和青少年积极参加体育活动，群众性体育在城乡广泛开展，涌现出了一大批体育人材。与此相反，有的地方只是片面强调提高，而不是面向群众，便出现体育后备力量缺乏、运动技术停滞不前的状况。事实证明，普及和提高是相辅相成的，普及不但不会妨碍提高，而且会给提高创造必要的条件。

我们强调普及，同时也要重视提高。我们反对的是光抓代表队，不抓群众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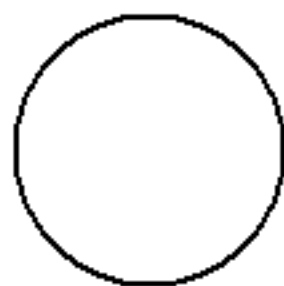
育，只抓提高，不抓普及，而不是反对抓代表队，抓提高。群众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不能总是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在抓好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同时，也要抓好代表队，注意培养骨干力量，认真提高技术水平，并以此指导和带动群众性体育活动的持久深入发展。要抓好体育骨干队伍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技术训练。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正确处理政治和技术的关系，既要反对不讲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单纯技术观点，又要批判“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谬论，树立为革命敢于抓技术的思想。不抓骨干队伍的技术训练，就不能提高；不能提高，就不能很好地指导普及，也不能通过各种友谊比赛充分反映社会主义时代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体育战线上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体育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要去占领；就是无产阶级占领了，资产阶级还要进行争夺。资产阶级无时不在用他们的腐朽思想和文化生活来腐蚀群众，毒害青少年。如果我们不用无产阶级文化，其中包括社会主义体育活动来活跃群众的业余生活，资产阶级思想就要乘虚而入。过去，在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的修正主义体育路线影响下，有个别地方搞“锦标主义”、“物质刺激”，摆阔气、讲排场，造成了损害身体，破坏团结，浪费人力资财，严重影响革命和生产的不良后果。我们虽然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斗争并没有结束，被批判过的东西还会寻找机会以另外的形式出现。警惕它的再现，出现了就和它作斗争，正是我们今后要特别注意的。在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时，我们要坚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坚持业余、自愿、小型、多样的原则，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各级党组织必须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体育路线，不断批判修正主义体育路线，使无产阶级牢牢占领体育这一阵地，才能使体育运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总结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的经验

钟 力 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农业连续十年丰收，工业生产持续上升，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基本建设进展较快，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

在工农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认真学习毛主席规定的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关系的光辉思想，总结我们实践这些思想的经验，进一步提高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自觉性，对于继续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要看到：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是从属于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为它服务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不仅是两个物质生产部门的关系，实质上是工人和农民两大劳动阶级的关系。农民同盟军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样，都是极为重要的，正如毛主席所说：“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正确处理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的关系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内容。为了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战胜城乡资本主义，巩固工农联盟，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正确处理工农业关系，正确处理工农两个阶级的关系。我们必须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看待正确处



理农、轻、重关系问题，进一步提高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自觉性。

二十二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唯物辩证法同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斗争。

毛主席早就科学地阐明了农业和工业的辩证关系，指明了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关系的途径。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中再次明确指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以后，毛主席又进一步阐述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理论，并把它概括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指出要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由于我们贯彻执行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及时排除了刘少奇一伙推行的“重工轻农”、“以重挤农”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农、轻、重关系处理得较好，使我国农业生产稳定增长。农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轻工业、重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迅速发展。我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农副产品和日用工业品丰富。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进展较快的重要原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毛主席关于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相互关系的科学分析，是非常正确的。什么时候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贯彻执行这个总方针，农业和工业就迅速发展；什么时候背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违反了总方针，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就受到挫折。从全国看是这样，从一个地区来看，也是这样。

有的同志往往孤立地互不联系地看待发展重工业和发展农业、轻工业，只看



见三者**在劳动力、资金、设备和材料等分配上存在矛盾的一面，看不见它们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一面**。毛主席早就批判过这种错误思想，指出：“**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点必须肯定。重工业是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得到了优先增长，才能够不断用新的技术、新的设备去武装农业，武装轻工业，武装重工业本身，加强国防力量，促进整个国民经济迅速地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花很大气力抓好重工业的建设，切实抓好有关的重点企业的工作，及时地总结经验和解决生产发展中的问题，决不可掉以轻心。同时，优先发展重工业，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马克思在论及重农主义者时曾说：“**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资本论》）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社会主义经济。他只能从考察历史上各种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得出这个一般的结论。对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来说，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就更加明显。要发展工业，矿产资源、设备材料、技术力量等等，当然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但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看问题，最终决定工业发展规模和速度的是农业。农业发展了，才能提供发展工业所需要的劳动力、商品粮、副食品和工业原料，才能扩大工业品的市场，为工业积累更多的资金，促进工业更快地发展。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由于他们的工业发展是建立在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廉价的农副产品、工业原料、劳动力和向这些国家倾销高价工业品的基础上，不仅造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贫穷落后，也使本国农民濒于破产，使农业落后于工业，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畸形发展。正如列宁所说：“**农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这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现象，是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比例遭到破坏、发生危机和物价高涨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与此相反，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我国有最广阔的国内市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来自工、农业内部积累，农副产品依靠本国农业提供，工业产品的销售依靠国内市场。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发挥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按照农、轻、重关系的客观规律，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和工业。

在我们国家，轻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也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轻工业与人民的日常生活关系极为密切，发展社会主义轻工业，就会以日益增多的轻工业品支援农业，同时又可以使更多的农副产品成为轻工业的原料被利用起来，增加农民的收入，进一步促进农业的发展。多办轻工业，就可以使重工业获得更多的资金，更多的原料和生活日用品；同时，轻工业的发展又需要重工业部门提供大量原料和新的机器设备，这又可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先有农业的多，才有轻工业的多；先有农业、轻工业的多，才有重工业的多；重工业的多又转化为农业、轻工业的更多。这是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发展的辩证法。正确处理三者的关系，就可以使它们互相转化，相互促进，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全面地发展。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从一时一事孤立地看，用在农业和轻工业方面的劳动力、资金、设备、材料多一些，用在发展重工业方面的就少一些，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似乎就要慢一些。其实并不是这样。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农业、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就能更好更快地发展，结果速度不是慢了，而是快了。如果不懂得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发展的辩证法，以为从农业、轻工业挤点劳动力、资金、设备和材料，重工业可以发展快一些，结果就会和主观愿望相反，农业、轻工业的少将会转化为重工业的少，农业、轻工业的慢，将会转化为重工业的慢。所以，这里存在一个对于重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还是不厉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想得厉害，就要重视发展农业、轻工业，加速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这样，就会使重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地迅速地发展。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不是因此就不必花气力抓农业了呢？决不是。应当看到，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水平总的来说还是不高的。各地的发展情况也不平衡，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没有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我国还没有实现农业机械化，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还不强，农业生产的潜力很大。我国工业在不断发展，农村提供的商品粮和各



种工业原料还不能满足轻工业和重工业发展的需要。因此，要更多更快地发展工业，最重要的仍然是要继续大力发展农业。抓好农业，尽快地把我国农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进一步发挥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这是处理好农、轻、重关系的关键，是关系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

发展农业，最根本的是靠毛泽东思想，靠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靠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大寨精神，靠六亿农民。我们要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继续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同时，还要继续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工业要为农业服务，要大力支援农业。

工业部门要用更多更好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支援农业，以加速农业机械化的步伐。这是发挥工业主导作用的重要方面，是我国工人阶级支援贫下中农进一步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巩固工农联盟的光荣任务。努力实现农业机械化，是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重大措施。毛主席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实现农业机械化，才能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改变我国农村的落后面貌，逐步缩小城乡差别，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就可以腾出更多的劳动力搞深耕细作、多种经营和其他经济建设，就可以为工业提供更多的粮食、原料和劳动力，工业的发展就会更快。工业拿更多更好的机械、化肥、农药等支援农业，这些工业品就会转化为更多的粮食、副食品、工业原料和劳动力，反过来支援工业。因此，工业部门的同志要把支援农业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来做好，要切实把自己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为实现农业机械化贡献更大的力量。认为农业机械化与自己“关系不大”的思想是错误的。农业机械化是细致复杂的工作，涉及到钢铁、机械、燃料、化工、电力等许多工业部门，涉及到科研、生产、配套、维修等各个方面，工业部门只有牢固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做好这项工作。要特别注意生产当前农业急需的农机、配件、化肥、农药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各级农机修造网。地方工业要坚持为农业服务的方向，大力支援农业。计划用于农业的资金和钢材等物资要切实予以保证，不得挪用，不能减少。

工业要支援农业，农业也要支援工业。从农业看，正确处理农业和工业关系



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继续认真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正确处理农业内部各业之间和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要安排好农、林、牧、副、渔和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这样两个布局。这是一个关系到农业、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在国民经济中存在着三个主要比例：农业内部的比例，工业内部的比例，以及工业与农业的比例。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农业两个布局的安排情况，不仅影响农业本身的发展，而且对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发展也有直接影响。当前我国轻工业原料大约百分之七十来自农业，粮、棉、油、麻、丝等，都是极为重要的工业原料。林、牧、副、渔等项，有的是直接的工业原料，有的是工业发展不可缺少的。有了农业的全面发展，才可能有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全面发展。在以粮为纲、抓紧粮食生产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既可以为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又可以增加集体经济的积累和社员收入，为工业提供更广阔的市场，促进农业和工业更快地发展。因此，各级领导部门，农村人民公社要从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全局出发，来对待农业生产的两个布局问题，认真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把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处理好。工业以及其他各个部门，在支援农业时，也要从农业全面发展的需要出发，在提供工业品、制订合理的收购价格，以及运输、收购等方面，积极为促进农业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同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发展都有密切关系的，还有一个合理安排劳动力的问题。工业与农业各占用多少劳动力，存在着一定的客观比例。这个比例，归根到底是由农业发展的水平决定的。马克思说：“能够投于工商业上面而无须从事农业的劳动者人数——或如斯杜亚所说，‘自由的手’的数目——是取决于农业者在他们自身的消费额以上，能够生产多少的农产物。”（《剩余价值学说史》）我国当前农业机械化程度还不高，农业生产大部分要靠手工操作，劳动力是最主要的生产力。因此，必须十分注意合理分配劳动力，首先保证农业生产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这是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工业顺利发展的保证。如果工业劳动力和城市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农业发展水平所许可的限度，过多地从农业抽调劳动力，就会影响农业生产，增加农业的负担，这对农业的发展和工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所以，对于劳动力的分配，一定要根据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平，统筹兼顾，



合理安排，先考虑农业发展的需要，再考虑工业发展的需要。这是分配劳动力的一个基本原则。整个国民经济的劳动力分配要根据这个原则，一个地区的劳动力安排也要根据这个原则。

合理分配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劳动力，不仅是对农业的支援，也是对工业部门进一步挖掘生产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力促进。发展工业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一种是增加劳动力，扩大基本建设的规模。增加劳动力仅仅是发展工业的一种方法。不断提高广大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的路线觉悟和业务技术水平，充分挖掘现有设备和人力的潜力，研究、应用和推广新的科学技术，改善劳动组织和企业管理等等，比起单纯增加劳动力来，对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是更加有效、更加实际、也是更加重要的方法。这种方法，不增加或少增加投资，不增加农业的负担，就能够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工业品，不仅能支援农业更快地发展，也能为工业建设提供更多的资金，是一种多快好省的办法。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政治挂帅，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广泛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力求在不增加或少增加劳动力的情况下，增加产量，提高质量，使一个人发挥两个人以至几个人的作用，使一个厂发挥两个厂以至几个厂的作用。

从长远看，要扩大再生产，不进行基本建设是不行的。但是，在一定时期内，由于人力、物力、财力总有一定的限度，基本建设的规模不能太大，不能超过农业生产发展所许可的水平。同时，必须按照统一的计划，分清轻重缓急，先后主次，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但是，有的同志一谈到工业基本建设，总想把摊子铺得大一点，技术搞得洋一点，项目搞得全一点、多一点，每每分散兵力。要看到，如果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规模过大，分散了人力、物力、财力，不仅会拖长基建项目建成投产的时间，影响投资效果和重点项目的建设；还可能挤占发展农业的劳动力、资金、设备和材料，影响农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会影响工业的发展，其结果是想快反而慢，想大反而小。长与短，多与少，是相对的，辩证的。全和多，总是由不全、不多发展而来的。先有不全然后才有全，先有不多然后才有多。根据客观需要与可能安排基建项目，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用到



最需要的地方，建一个、成一个、投产一个，看起来好象少一点、慢一点，实际上是会更多一些、更快一些。

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是三个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农、轻、重的比例，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比例。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经常注意按照“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要求，处理好它们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完全有可能按照客观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提倡顾全大局”，从全局出发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安排农、轻、重的关系是领导机关和计划部门的事，同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关系不大。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固然，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范围安排好农、轻、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全局是由局部组成的，局部会影响全局。每一个地区的农业、轻工业搞得好不好，重工业的发展是否按照统一的计划进行，不仅会影响局部，也会影响全局。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全体。”又说：“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打仗是这样，经济建设也是这样。每个地区、每个单位都应当努力学会掌握农、轻、重关系的客观规律，并把自己的计划和工作，放在安排好农、轻、重关系这个全局中来考虑，在进行每一项经济活动，安排每一个基建项目的时候，在分配劳动力、资金、设备和材料的时候，都要考虑到全局，服从全局。这样就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地迅速地向前发展。

十五年前，毛主席曾经指出：“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我们要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以路线为纲，继续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不断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为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二年和第四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干部必须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江苏涟水县前进大队的调查报告

内容提要：怎样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前进大队党支部的体会是：必须抓紧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排除思想障碍，不断提高自觉性；还要采取措施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解决影响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实际问题，保证干部坚持参加劳动，又做好工作。由于这样做，去年这个大队的干部平均每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二百五十天以上。

涟水县前进大队，是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作过批示的单位，是当地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之一。这个大队的干部，平时参加交流经验等活动比较多。党支部八个委员，有两人是地、县党委和革委会的领导成员，工作比较忙。几年来，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的教导，不断提高路线觉悟，克服阻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糊涂思想，采取有效措施，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去年，平均每人劳动了二百五十天以上，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等主要干部，多的劳动了二百七十天，少的也有二百一十天。

去年秋天，有个青年干部去外地参加中心工作，仍然象在本大队一样，白天参加劳动，把工作挤到晚上做，一个月就劳动了二十五天。大队一个妇女干部，爱人和女儿都在外工作，儿子参了军，家庭负担轻，有病还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群众劝她多休息，她总是说：“我在旧社会逃荒要饭，父亲饿死在外。解放了，翻了身，我不能当了干部就脱离劳动，忘本变质。”去年她劳动了二百七十多天。

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促进了干部世界观的改造。去年冬天，公社党委拨给七十三岁的县革委会副主任、大队老



支部书记三百斤煤炭烤火。她激动地说：“感谢党的关心，同志们的照顾，现在生产这样忙，我不能坐在家里烤火。”把煤炭全部送到了集体的砖窑上去了。支部副书记的住房坏了，群众多次劝他把房屋修一修，他总是说：“先让贫下中农来，我不急。”贫下中农趁他因公外出时，主动帮他把房子修了起来。群众赞扬大队干部：“真是我们的好带头。”

深刻的思想革命

前进大队的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他们不断提高路线觉悟，经常开展思想斗争的结果。几年来，前进大队党支部着重解决了三种糊涂思想。

原来，有少数人认为，干部主要是摸情况，出点子，领导群众抓革命，促生产，劳动少一点是“小意思”。一度出现了“坐在屋里开会，站在田头指挥”的现象。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到底是“小意思”还是带根本性的大事？毛主席指出：“**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为了统一认识，党支部举办了专题学习班，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这一教导，联系本大队的实际进行讨论。多数同志认为，干部参加劳动，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干部参加劳动，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干部不参加劳动，就会从脱离劳动到脱离群众，资产阶级思想就会腐蚀自己，从个人来说，就会变质变修；从一个支部来说，就不能成为团结与带领群众进行三大革命运动的战斗堡垒。大家以本大队党支部老书记为例，进行典型分析。老书记当干部三十多年，始终不脱离劳动，因此，在关键时刻，能紧紧依靠贫下中农，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她带领贫下中农在全县成立了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她领导贫下中农顶住了“三自一包”的妖风，进一步巩固了前进大队的社会主义阵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她又和贫下中农一道，排除“左”、右干扰，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取得了革命与生产的胜利。大家从实践中体会到：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决不是什么“小意思”，而是关系到人不变修，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带根本性的大事。

这个大队的一些青年干部，认为自己的出身好，劳动少点“变不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支部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联系实际，对青年干部进行路线教



育。这个大队原来有一个干部，在旧社会逃过荒，要过饭，当过童养媳。解放后，当了干部，由于脱离了劳动，脱离了群众，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犯了严重错误。事实说明：出身好，对于思想改造是一个有利条件，但不能保证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人的思想时刻都在受阶级斗争的影响，不努力进步，就会落后，“变不了”的想法是形而上学的。认为“变不了”，事实上已经在向坏的方面变，资产阶级思想已经在那里起作用。毛主席教导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变不了”的想法，就是否认阶级斗争，是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映。通过教育，大家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有个青年干部，贫农出身，又是烈属，曾经认为“再变也轮不到自己”，一度很少参加劳动，脱离了群众。认识提高以后，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重活干在前，脏活抢着干，受到了群众的称赞。她深有体会地说：“好苗靠锄，好钢靠炼，人要自觉改造才能进步。”

还有的人认为，干部参加劳动只要“带个头”就行了，不需要坚持。因此，参加劳动好象“蜻蜓点水鱼打花”，不能扎扎实实地干。党支部对这些同志也进行了认真的帮助，使他们懂得，在劳动上，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但是，干部参加劳动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带个头”，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观，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劳动为了“做个样子”，是资产阶级作风的表现，“劳动镀金论”的反映。干部要在劳动问题上真正起模范带头作用，只有通过扎扎实实地持久地参加劳动，认真地改造思想，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毛主席指出：“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解决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几千年来的剥削阶级思想残余还没有彻底铲除，刘少奇一类骗子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没有完全肃清，路线教育稍微一放松，脱离劳动的错误倾向又会滋长起来，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仍然会遭到破坏。因此，前进大队党支部把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支部建设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来抓，不断提高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每月底由党支部向群众介绍每个干部的劳动情况，然后请党员和群众进行评论。在支部内部，发现支委中有脱离劳动的思想苗头，就及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支部还努力做到：检查工作的时候，注意检查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总结工作的时候，注意总结干部参加劳动



的经验。

促进干部参加劳动的措施

前进大队党支部在抓思想教育的同时，还采取了一些促进干部参加劳动的措施，解决影响干部参加劳动的实际问题，保证干部既坚持劳动，又做好工作。

一、分管一项工作，固定一个点。以前，这个大队的干部分工不够明确，也没有固定的劳动地点，群众批评他们是“工作满天飞，劳动不沾边。”一九六八年，党支部听取了群众的意见，每个大队干部都明确分了工，分管一项工作，固定在一个生产队劳动。对于大队面上的工作，采取定期碰头，互通情报等措施，加以解决。这样做好处很多，一是干部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事务，增加劳动时间；二是有利于群众监督和帮助；三是蹲在点上，了解情况，便于更好地领导生产，做好工作。有一个支委分管棉花生产，由于她把劳动和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不但坚持每年都劳动二百六十天以上，而且从工作中总结了盐碱地上长好棉花的经验，使棉花亩产由一九六八年的四十多斤增长到一九七一年的一百零九斤，超过了《纲要》。

二、减少会议，提高会议质量。去年年初，前进大队会议开得比较多，群众有意见。干部也反映：开会多了，劳动少了，脑子空了，离群众远了。党支部认识到：会议多，时间长，使干部陷入会议堆里，就会脱离劳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只有认真改变会风，提高会议质量，才能保证干部坚持劳动。他们研究了一套办法：对上级的条条会议，由分工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干部参加，不把主要负责干部变成“会议干部”。可开可不开的会议就不开，能够在会外或个别解决的问题，就不拿到会上去。开会主要研究重大问题，确定原则，不搞烦琐哲学。在时间安排上，一般会议放在晚上或雨天开；有些会非在白天开不可的，事先作好充分准备，开短会。这样做减少了会议，保证了干部的劳动时间。去年秋播时，大队为了贯彻上级搞好秋播的指示精神，几个干部带领一些社员播种了二亩麦子，然后召开现场会，结合实际传达上级指示。往年解决这样的问题要用一天时间，这次只花了半个小时。到会的同志反映：“有样子摆在面前，看得见，记得牢，时间又短，这样的会开得好。”

三、落实党的政策，合理补贴工分。农村人民公社有关条例规定的干部工分补贴办法，是根据现阶段农村的具体情况，根据干部的工作需要和参加劳动的实际可能性制订出来的。补贴工分过高，势必使干部产生依赖思想，增加社员负



担；补贴过低，就会影响干部生活。只有正确执行政策，才能充分调动干部做好工作和参加劳动的积极性。过去，这个大队在补贴干部工分问题上，曾出现过一些违反政策的现象。一种是不和社员一样评工记分，有的干部仅到田里干一会，就记半日或全日工；另一种是对误工控制不严，对劳动没有具体要求，年终分配一律补足同等劳力的工分。由于没有认真执行政策，挫伤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一九六九年以前，全大队干部全年劳动平均每人只有一百多天。一九七〇年以来，他们坚决落实党的政策，召开社员大会讨论决定，除对大队会计实行定额补贴以外，其余干部全部实行误工补贴，同社员一样评工记分。以前，这个大队的会计，一个月只劳动两三天，现在，他经常利用晚上搞业务，白天坚持劳动，每月劳动一般都在十八天左右。一九七〇年，全大队干部的劳动日大幅度增加，干部补贴工分只占社员总工分的百分之一。一九七一年，干部补贴工分又下降到总工分的百分之零点七。

四、发挥“一班人”的作用，保证主要干部参加劳动。这个大队认真执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以后，大部分干部的劳动时间都得到了保障，但大队几个主要干部的劳动时间仍然没有很好解决，原因是这些干部陷进了事务圈子，形成了“里里外外一把手，大事小事我当家”的被动局面。后来，他们总结了经验教训，遵照毛主席关于“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的教导，相信和依靠“一班人”，认真改进工作作风。重要问题集体讨论，做出决定，分工去办，调动全体干部的积极性，发挥大家的作用，使主要干部摆脱事务圈子，从被动局面中解放出来。去年秋收秋种，在同一个时期内要完成五项比较大的任务，由于他们合理安排，不但工作完成得好，大队的主要干部也坚持参加了劳动。

带来的变化

前进大队的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后，给革命和生产带来了显著的变化。

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进一步落实了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前进大队的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和贫下中农同呼吸、共命运，扎根于群众之中，保持和发扬我党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增强了革命团结。这个大队的社员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斗，与阶级敌人斗，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夺得了农业生产的丰



收。这个大队的土地原来是春天白茫茫、秋天水汪汪的盐碱地。为了改变低产落后面貌，广大群众在党支部带领下，发扬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进行耕作制度的革命，把一年一熟的旱谷，改为稻麦轮作的两熟田。一九七一年，为了完成大面积旱改水任务，干部和广大社员群众一起，风里来，雨里去，整整在水里干了八十多天。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夺得了水稻的丰收。试种的双季稻，亩产达到一千零三十九斤。粮食生产比前年增产一成，连续两年超过了《纲要》规定的指标。

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是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是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前进大队的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能经常了解实际情况，总结实践经验，加深对党的路线和政策的理解。由于他们参加劳动，亲自实践，接触和了解到许多具体问题，使党的政策的原则性和这个大队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排除“左”、右干扰，保证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例如，去年他们在落实党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政策的过程中，就较好地解决了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过去，这个大队的妇女和男子干一样的活，完成同样的劳动质量和数量，但工分却比男劳力少。干部在实践中感到不解决这个问题，不利于进一步调动妇女的劳动积极性，就发动大家批判了轻视妇女的封建思想，实行了男女同工同酬。实行中，由于部分同志片面理解这个政策，又出现了片面提高妇女工分，不同工也同酬的偏向，影响了男劳力的积极性。党支部就进一步帮助大家正确理解党的政策，使“男女同工同酬”得到了较好的落实。

毛主席教导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前进大队的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实践中逐步取得了革命和生产的领导权。去年秋天，正当水稻抽穗时，发生了罕见的粘虫灾害。开始，凭老经验办事，按常规给水稻喷药治虫，没有效果。经过试验，农药质量是好的。为了查明原因，党支部书记带领科技小组，伏在田埂上观察了一天一夜，摸清了粘虫白天爬进稻根、晚上出来活动的规律，把白天打药改为夜间打药，一举扑灭了虫害。

前进大队的干部决心在成绩面前不止步，反骄破满，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和广大社员一起，夺取今年革命和生产的更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江苏省淮阴地区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涟水县委员会 联合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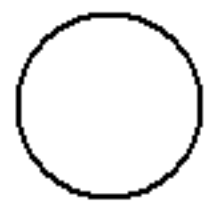


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 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驳“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

田 志 松



历史是谁创造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是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长期斗争的根本问题，也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

几千年来，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一贯颠倒历史，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把剥削阶级中的少数英雄人物说成是有“天赋才能”或代表“神的意志”的，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把人民群众诬蔑成只能受他们任意摆布的“群氓”、“阿斗”，甚至是阻碍历史前进的“惰性物质”。

按照这种反动谬论，在剥削阶级专政的社会中，历史的发展是由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少数统治者的意志所决定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群众除了俯首听命、接受奴役以外，就只能仰望苍天，等待“神仙”、“救世主”的来临。唯心史观就是这样一种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第一次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论证了奴隶们创造历史的伟大真理，把剥削阶级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使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彻底破产，从根本上推翻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反动统治的理论基础。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反复地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教育全党，教育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教育一切革命者，并同形形色色的历史唯心论进行了长期的坚决的斗争。毛主席为我们党规定的群众路线，毛主席关于“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我们应当相信



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等等教导，是对于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所长期宣传的否定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深刻批判。

但是，剥削阶级决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在他们被革命人民推翻以后，也决不肯轻易抛掉他们妄图复辟的理论基础。刘少奇一类骗子抛出唯心论的先验论作为他们反党的理论纲领，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就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又一深刻反映。当这一反动谬论遭到全国人民的无情揭露和有力批判以后，他们又抛出所谓“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谬论，妄图用二元论的诡辩手法，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哲学上的二元论把精神和物质说成是两种独立并行的宇宙本原，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共同创造论”是把英雄和群众说成是两种独立并行的推进历史的动力。

所谓“共同创造论”，真的承认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吗？完全不是。在刘少奇一类骗子的眼里，老百姓只知道“恭喜发财”，工人只不过要求“少做点工，多搞点钱”。伟大的人民群众被他们诬蔑成这个样子，哪里还找得到一丝一毫对历史的创造作用。相反，他们把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说成是“先知先觉”，一个民族“所以存在，所以衰而复振，亡而复存，正是受他们之赐的”。看看他们对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的吹捧，再看看他们对人民群众的诬蔑，所谓“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谬论，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唯心史观，不就很清楚了吗？

不承认奴隶们即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就必然承认英雄创造历史。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共同创造论”，把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调和起来，既有英雄，又有群众，装扮得何等公允，何等光滑。但是，这种似是而非的诡辩和四面光滑的外貌，正是政治骗子的特征。

恩格斯指出：自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推动生产方式的更替和社会制度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的矛盾表现为代表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革命阶级同维护旧的生产关系的反动阶级之间的斗争，而人民群众则是阶级斗争的决定力量。一切社会变革，都是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结果。人民是划分为阶级的，各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人民有不同的阶级内容。但不管在什么时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人民群众，是劳动人民。一切先进的思想和理论都是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和革命意志的反映，一切科学技术都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结晶，一切进步的文化艺术都根源于人民群众丰富的斗争生活，离开了人民群众生产斗争的实践，连社会也无法生存，还哪能谈得上历史的发展？在阶级社会中，离开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也谈不到历史的发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英雄人物的作用呢？难道历史唯物论否认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吗？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人物的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是英雄人物，如何正确认识英雄人物的作用，以及如何看待英雄人物的作用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关系。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和刘少奇一类骗子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和尖锐的斗争。

在阶级社会中，英雄人物是有阶级性的，超阶级的英雄是没有的。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英雄观。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看来，英雄人物只能是人民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符合历史发展方向、推动历史前进的杰出人物。这种英雄人物的出现，正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表现。剥削阶级则把那些最能维护他们阶级私利和剥削制度的代表人物视为“英雄”。反动统治阶级决不承认无产阶级英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也决不把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当作英雄。例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把领导千百万农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清王朝反动封建统治而至死不屈的洪秀全看成是英雄，而反动统治阶级却辱骂他是“发逆”。与此同时，反动统治阶级把勾结帝国主义、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刽子手曾国藩说成是“中兴名臣”，吹捧为“英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则把他看作是死心塌地维护反动统治的奴才、卖国贼。正如毛主席所说，在无产阶级看来，**“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



死，**就比鸿毛还轻**”。英雄观上的这种根本对立，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决定的。至于剥削阶级在它的上升时期和没落时期，由于所处的历史地位不同，因此，他们的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也是不相同的。

英雄人物决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人类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个科学论断。被马克思称赞为古代史上“**最辉煌的人物**”的斯巴达克，原不过是古罗马一个普通奴隶。奴隶起义的革命风暴使他成为一个指挥千军万马、冲击奴隶制度的英雄。陈胜、吴广原来也只是普通的农民。秦末阶级矛盾的激化，大规模农民起义必不可免，他们才成了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的领袖。即使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也有很多杰出人物是来自人民群众的。法国大革命时期不少有军事才能的将领，在革命前原不过是默默无闻，甚至是受人鄙视的演员、排字匠、理发匠、染匠、小贩或下级军士。如果不是革命，这些人怎么会成为杰出的统帅？列宁说过：“**一切真正革命的标志**”，就是从“**被压迫劳动群众中，很短时间内就可以产生出十倍的甚至百倍的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代表人物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这种情况就更普遍、更显著。毛主席曾满腔热情地指出：伟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并把支持和帮助群众中涌现的先进人物看成是支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重要内容。所有这些都说明，各个时代的英雄人物是适应人民群众的斗争需要而产生的，每当历史提出了新的斗争任务，就一定会涌现出领导群众斗争的英雄。

马克思主义认为，英雄人物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起重大作用，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他们代表了革命阶级和进步势力的利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任何英雄豪杰的力量只能来自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根本问题，是要代表先进阶级，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



要求，并进行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具体的革命实践。“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谬论，正是抹煞了代表什么阶级这个根本的原则问题，妄图使革命阶级同反动阶级“合二而一”，这当然是一种唯心论的诡辩。

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的英雄人物是革命思想的创造者或传播者，是革命斗争的组织者，他们比一般群众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他们能不能集中群众的智慧，领导得正确与否，对斗争的成败有很大的影响。在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况，虽然有成功和胜利的一切可能性，但由于领导者不善于利用这些可能性，结果斗争还是失败了。这说明，英雄人物对群众创造历史的加速或延缓，是有很大影响的。但他们只能影响历史前进的速度，却不能改变历史前进的方向。英雄人物是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只有同群众站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先进的思想、理论是人民群众革命要求的反映和斗争经验的总结，只有被群众所掌握，才能变成推进历史的物质力量。正如毛主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十分深刻地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毛主席这段话，击中了刘少奇一类骗子唯心史观的要害，今天重新学习时使我们感到多么亲切啊！

在剥削阶级上升时期，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少这样的英雄人物，他们开始革命，甚至有很大影响，但后来由于脱离了广大群众，终于陷入失败或颓唐，为群众所抛弃，所忘却。在资产阶级革命家中，这一类的“半截子英雄”几乎到处可见。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现过罗伯斯庇尔这样风云一时的人物。以他为代表的雅各宾派，在革命初期为了借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曾经比较坚决地主张满足人民群众的某些要求（例如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而能够取得群众的支持，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表现出了革命的气魄。但他毕竟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刚刚取得胜利以后，就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甚至进而镇压群众，结果失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也就无力抗击反动势力的反扑，终于自己也被反动势力送上了断头台。鲁迅曾经谈到辛亥革命时期的章太炎，当年“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



终不屈挠”，在群众中曾有过很大影响，起过不小作用。但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他却“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其结果“既离民众”，就不能不“渐入颓唐”，终为大多数人民群众所淡忘。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这种特点是由其阶级本性决定的。即使在反封建斗争时期，资产阶级与劳动群众在反对封建制度方面虽然有部分的暂时的一致，但在阶级利益上仍然存在着根本的对立。资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过程中往往由于其狭隘的阶级利益而害怕群众，表现出动摇、妥协，甚至背叛；而在取得政权以后，他们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对立也就日益突出。所以，尽管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是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领导，但是广大人民群众仍然是革命的主力军。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来克服这些领导人物的妥协性或反动性；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经过反复进行搏斗，不断冲垮反动势力的进攻和复辟，才能比较彻底地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也有不少革命的同路人，在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停顿不前，脱离革命，以至背叛革命。这些人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这些人的反动面目一旦暴露，就一定会被人民所唾弃，而成为历史的丑角。至于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头子，他们乃是历史发展的障碍，只有人民群众起来把他们打倒，历史才能前进。

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讲到我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革命形势时指出：“**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关于重庆谈判》）这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革命发展的普遍规律。世界是进步的，革命势力一定要战胜反动势力，任何反动势力也不可能改变历史前进的总趋势；同时，在革命过程中必然要经历各个发展阶段，要克服各种困难和障碍，克服反动势力的抵抗，以至经历各种曲折，这也是必然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革命的复辟，造成暂时的历史倒退。但这不过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反复较量，恰恰反映了阶级斗争的曲折，绝不意味着有什么特殊的人物有特殊的“才干”，可以扭转历史的车轮。中国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和法国大革命后的拿破仑都曾搞过短期的帝制复辟。他们的上台都表现了当时阶级斗争的反复性。但他们的覆灭又都证明，一切反动派终究都要垮台。在世界上某些国家、某些地区历史一时的倒退，都从反面教育了革命人民，经过正确地总结经验，就为人民革命事业的更大的胜利准备了条件。这些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事实，



都证实了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个真理是不能篡改的。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英雄；不是英雄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英雄；也决不是什么“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而是奴隶们创造历史。

无产阶级领袖代表着人类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他们同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有原则的区别。他们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自始至终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深刻地总结了人民群众的斗争经验，因而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最广泛的支持和最衷心的拥护。他们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并运用于革命实践，因而最有远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而没有历史上其他阶级的杰出人物所不可克服的那种阶级局限性。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领袖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因而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这种威信是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无产阶级领袖在历史上所起的这种巨大作用，是以往任何英雄豪杰所不能比拟的。

那么，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就是“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呢？同样不能。因为无产阶级领袖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活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们的出现及其思想的产生，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创造历史过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是这个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产物，不是在这个过程以外孤立存在的东西。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发展到第二个时期即“**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才产生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观点，正是充分肯定了作为先进阶级代表的革命领袖的伟大历史作用；而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谬论，则把“英雄”看成“人民”之外、之上的一种东西，用以歪曲、贬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抬高他们自己。二者的本质区别就在这里。

马克思主义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绝不意味着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刘少奇一类骗子在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同时，又鼓吹任何群众运动都是“天然合理的”谬论。这种谬论乃是马克思主义早就痛斥过的“自发论”的翻版，它和历史唯物论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毫无共同之处。任何



群众斗争，如果没有正确的领导，执行正确的路线，就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取得成效。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消灭剥削制度的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这场革命斗争的深刻性和广泛性，是过去任何革命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就更加需要先进思想的武装和自己的领袖及先锋队的坚强领导，正确路线的指引也就越加显得重要。**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斗争并战胜它们的历史。没有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正确路线，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鼓吹“自发论”，就是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否定思想上政治上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对于革命事业成败的决定作用，而企图把群众运动引到邪路上去。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经历了由不自觉走向逐步自觉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为人类从盲目受历史支配的必然王国走向自觉掌握历史的自由王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还要经历艰巨曲折的斗争，这种斗争必须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毛主席为我们党所制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求我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真心实意地向群众学习，同时要求我们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不断提高群众的觉悟水平，领导群众前进。列宁说过：**“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情绪，而是引导群众前进。”**（《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批判否定党的领导谬论。

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都是政治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理论基础。刘少奇一类骗子所鼓吹的反动的唯心史观则是地主资产阶级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纲领。我们只有遵循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才能坚持唯物史观，坚持群众路线，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文艺问题上两种认识论的斗争

方 刚

三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我们党在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方面最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之一。《讲话》总结了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

毛主席在《讲话》一开始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毛主席提出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基本观点，深刻地说明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人的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它既划清了同唯心论的认识论的界限，也划清了同旧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界限。毛主席用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基本原理，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一系列问题，制定了一条完整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彻底揭穿了王明、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所贩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谬论，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战胜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巨大威力。

把反映论运用于文学艺术，首先就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来解决文艺为谁服务的根本方针问题。毛主席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提到两种认识论的高度，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毛主席指出的这两个不同的出发点，鲜明而透彻地揭示了两种认识论的根本分歧。从抽象的定义出发，是唯心论的认识路线；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是唯物论的认识路线。在文艺方针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和斗争，正是这两种认识论斗争的反映。在《讲话》中，毛主席批判了周扬一伙在文艺方针问题上同群众需要不相符合、同实际斗争不相符合的唯心论观点，从分析当时抗日战争各条战线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



解决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问题。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文学艺术中，人民却成了渣滓。只有遵循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才能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周扬一伙站在唯心论的立场上，从抽象的资产阶级的定义出发，根本否认当时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差别。他们一贯坚持用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代替毛主席从客观实际出发而引出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来指导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例如，周扬之流鼓吹“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胡说什么作者“要有对于人的深挚的热爱”。这个从抽象的“爱”出发的唯心论观点受到《讲话》严厉批判后，周扬仍然顽固地坚持其反动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继续叫嚣：“人类之爱，还是要的”。其实，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爱，而周扬竭力宣扬超阶级的爱，实际上是要人们去爱地主资产阶级，为他们搞“全民文艺”制造理论根据。正如毛主席在《讲话》中所尖锐指出的：周扬们妄想“**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很明显，如果周扬一伙的阴谋得逞，不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会被他们改变，还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把反映论运用于文艺创作，就要把为工农兵服务和深入工农兵、反映工农兵的斗争生活统一起来。毛主席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并且强调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毛主席的这一科学论断，包含着深刻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内容。作家的头脑，只是一个“加工厂”，没有客观的人民生活所提供的原料，就不能起到“加工厂”的作用。既然文艺的创作源泉只能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斗争生活中来，那么，离开了人民生活，文艺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就必须深入工农兵，反映他们的斗争生活，歌颂他们的劳动和斗争。否则，就谈不上为工农兵服务。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经过实践得到正确认识，再回到



实践中去。把它运用于工作路线上，必然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因此，我们的文艺创作的过程，本质上就是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能动地反映客观现实世界的过程，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文艺工作者要熟悉工农兵，表现工农兵，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就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只有深入工农兵，同工农兵相结合，才能逐步地从站在工农兵之外或站在工农兵之上转变到和他们站在一起，从不熟悉、不热爱他们转变到熟悉、热爱他们。如果口头上承认要为工农兵服务，实际上却脱离工农兵群众的斗争生活，要想表现工农兵只能是一种唯心论的妄想。

周扬认为文艺是“自己的主观和客观完全融合”的产物，创作的出发点即所谓“融化了客观的主观”。这和胡风叫嚣过的“主观战斗精神”和“自我扩张”完全是一码事。既然一切从“自己的主观”出发，把文艺创作当作自我表现，还要不要反映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呢？当然不要了。一九六二年，周扬一伙炮制了一个所谓“文艺十条”的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其中重点的一条，就是反对表现工农兵斗争生活，提倡什么题材的“多样化”。他们妄图从题材问题上打开缺口，改变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使文艺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苏修叛徒集团奉为宝贝的这个黑纲领究竟是什么货色呢？不妨把这个黑纲领中关于题材问题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略举一二，进行再批判。

“对于题材，不应作任何限制”，“一个作品的成功或者失败、教育作用的大小，并不完全决定于题材”。这是国内外修正主义者反对文艺表现工农兵、否定写重大题材的一条重要的理论根据。在他们看来，作品的思想和作品的题材是可以分裂的，思想不是从题材中提炼出来的。既然一定的主题思想可以不受一定的题材范围的限制，那就必然把主题思想抽象化，神秘化；同时也必然把题材当作表达这种抽象思想的一种假托性的符号。至于选用哪一种符号，则完全由作家的主观思想决定，用周扬的话来说，是由“融化了客观的主观”决定的：反正我相信什么就写什么，高兴怎么写就怎么写，既不要根据客观实际，更不受客观实践的检验，因为我的“主观”早已“融化了”一切客观。这种理论并不新鲜，其实就是马赫主义的以“感觉复合”说为核心的“符号论”的翻版。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时指



出：“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区别”，就在于“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在文艺问题上，承认前一条认识路线（即反映论），就必须承认题材的客观内容是第一性的，作品的主题思想是第二性的。“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主题和题材的关系，是不能颠倒的。革命的主题思想只能从革命的题材内容即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中概括、提炼出来。要反映和歌颂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风格，当然只能取材于无产阶级的战斗生活，难道还可以取材于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吗？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的，是坚持文艺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自己世界观的。而选择什么题材，本身就是一个立场问题，世界观的问题。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必然要描写工农兵斗争生活的重大题材；反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必然要反对写工农兵的重大题材。有了重大的题材，如何把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从中提炼出深刻的主题思想，形成正确的艺术构思，就需要文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充分发挥自己的革命的能动性。就认识论来说，我们提倡写工农兵的重大题材，就是尊重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历史事实，尊重“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这一客观真理。周扬之流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提出的反“题材决定”论，就是否认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否认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这个真理。

周扬一伙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谓的题材“多样化”，是他们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搞“全民文艺”的一张招牌。他们所谓的“反映丰富多彩的人民生活”，是指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斗争生活吗？是指《讲话》所阐明的一切文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吗？不，决不是。人民群众在他们的眼里，只不过是“群氓”和“暴徒”而已，哪里还谈得上人民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他们高喊“反映丰富多彩的人民生活”，不是别的，而是如同胡风叫嚣的，描写人民身上“精神奴役的创伤”，就是以他们的面目来涂改、歪曲、丑化人民群众的本来面目。这种描写，正是他们所谓一切从“爱”出发的结果。他们的“人类之爱”越是“深挚”，就意味着把人民群众描写得更“卑微”，而把他们所代表的剥削阶级刻画得更“圣洁”。因此，从“爱”出发，离开工农兵的斗争生活来侈谈题材“多样化”，只能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暴露”所谓人民“天生愚蠢”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是歌颂剥削阶级的吃、喝、玩、乐和什么



“生与死”、“永恒的爱情”之类狭窄、庸俗、空虚的东西。他们把作品当作地主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的具体内容，无非是这些东西。周扬一伙把这一套唯心论的老古董当作二十世纪的新产品来推销，还要贴上广告，说是要“为百分之一百的人服务”。但是，自从有阶级以来，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满足”一切阶级要求的文艺作品。凡是标榜不分阶级，一概为之服务，就一定是“百分之一百”为剥削阶级服务。周扬一伙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和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妄图在自由选择题材的幌子下贩卖“全民文艺”黑货的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

把反映论运用于文学艺术，就要把为工农兵的动机和被工农兵欢迎的效果统一起来。毛主席指出：“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讲话》着重批驳了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唯心论观点，精辟地阐明了动机和效果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判断认识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按照反映论的基本观点，我们“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文艺究竟为谁服务，要看它对哪个阶级有利。任何作品，必须使工农兵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作品。如果一部作品，事实已经证明在群众中产生了坏的效果，不符合工农兵的根本利益，还要说主观动机是好的，那就是依自己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作品的好坏。坚持这种以自我为中心，既不从客观实际出发，又不受客观实际检验的观点，就是纯粹的唯我论。

现代修正主义者攻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庸俗化的实用主义方针”，是“把艺术和宣传作用混为一谈”。这实际上是反对革命的功利主义。

毛主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马克



思主义者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所以公开主张革命的功利主义，是根据文艺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这一事实的。因此，凡是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文艺作品，我们一概欢迎；反之，我们就要排斥。文学艺术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性，即以形象的感性的形式来反映现实生活。但是，它既然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反映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也就必然具有宣传作用。正如鲁迅所指出的：“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文艺与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是为修正主义政治路线服务的。苏修搞的那一套乌七八糟的御用文艺，都是为他们的反革命统治制造舆论的。这才是道道地地的、既“庸俗”又反动的实用主义。他们标榜超功利主义，恰恰说明他们的伪善，是掩盖事实真象的唯心主义鬼话；他们对《讲话》的恶毒攻击，恰恰说明《讲话》是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文献。

两种认识论表现在文艺问题上，就是从自我出发、做一个高踞于群众头上的精神贵族，还是从工农兵革命实践出发，做一个工农兵群众的忠实代言人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这也就是按照哪一种认识论来改造党、改造世界的问题。两条文艺路线斗争的焦点在这里，两条政治路线斗争的焦点也在这里。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要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改造世界，就是肯定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众，为他们的根本利益服务。与此相反，按照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以唯心史观来改造世界，那就必然否定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为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因此，要按照无产阶级面貌改造世界，就要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

三十年来，政治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讲话》所提出的一系列英明论断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普遍真理。今天，当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正在深入进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继续深入学习《讲话》，宣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批判唯心论和唯心史观，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断前进。



“复制天才”论是反动的优生学的新变种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 梁正兰

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在苏修的刊物上掀起了一阵颇为有趣的“学术讨论”。它是从犯罪现象到底是“社会因素”造成的还是“生物学因素”造成的这一讨论开始的。在苏修叛徒集团统治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社会风气败坏，流氓、盗窃成风，引起了劳动人民极大的义愤。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掩盖社会矛盾的阶级根源，就导演了这一出颇为好看的滑稽剧。一帮御用学者出场表演，拼命鼓吹犯罪的根源决定于先天的“恶”的遗传，决定于与生俱来的“兴奋性”、“易怒性”，把它从社会原因转向生物学原因。

既然“恶”是遗传决定的，为了适应苏修统治集团的需要，有的学者就进一步提出了“善”也是先天决定的，鼓吹“天才”是“难能可贵的基因组合”。有几个最有“灵感”的学者，根据胚胎学家对青蛙的细胞核移植成功的试验，立即“创造性地”提出了采用细胞核移植的方法来人工“复制天才”的理论。

这一妙论一出笼，苏修统治集团就十分重视，如获至宝，以为可以从中找出解决他们政治经济危机的药方。一九七〇年由《哲学问题》编辑部出面，召开了“人类遗传学及其哲学和社会伦理学问题”座谈会，专门讨论人工“复制天才”问题。

在几年来极为热闹的讨论中，学者们各抒高见，妙语惊人，真可谓洋洋大观，别开生面。其中有一位生物学博士叫得最凶，如果以他作为这些学者的代表，那是当之无愧的。我们不妨介绍一下这位博士“复制天才”的奇妙理论，供大家鉴赏。

这位博士首先介绍了一项青蛙核移植的试验，即把一个蝌蚪的肠细胞核，移植到事先去了核的蛙卵中，然后能发育出一只“与提供肠细胞核的那个蝌蚪没有区别”的青蛙来。在此基础上，博士充分发挥自己并不缺乏的“想象力”，灵机一动，从蝌蚪到了人，灵机再动，从无足轻重的“普通居民”到了天才。博士说，从母体中取出卵子，去掉细胞核，然后从天才“授体”任取一小块组织，取其细胞核置于



卵中，放回母体，这样长大的婴儿，便是与天才“授体分毫不差的复制品”。为什么？据说细胞核里染色体上的基因是遗传性的决定者，人身上任何细胞核的“染色体中包含着人的一切性状的‘记录’”，当然也包含着天才的“记录”。只要由这个细胞核在母体中发育成一个新人，这个人就将承继那个从其“身上取用了细胞核的”人的“一切性状”，包括天才。

当然，对于博士这样“复制天才”能否成功，人们是应该感到放心的，因为首先，博士把人的一切性状统统集拢来，让染色体充当“总管”。这样一“集中”，博士就容易工作。其次，博士让人体上不管什么地方细胞核里都带上一整套遗传基因，而特别重要的是带上主管天才的基因，这样博士“复制”起来就很便利。第三，博士命令，把不管什么地方细胞核移到卵里，卵的细胞质和母体都不许对这个核发生影响，不用说这也很重要。有了这一条，就可以象“蔷薇扦插”一样，“无性繁殖”出大批“完全相同”的天才来，既可以避免有性杂交时选配亲本的麻烦和后代分离出“半天才”、“非天才”的危险，又可以不受细胞质和母体的干扰，保证复制的天才不会走样。

不过遗憾的是，科学的事实，并不象博士那张可以信口开河的嘴巴那样听从博士的指挥。不仅染色体中包含聪明才智的“基因”是海外奇谈，就连可以遗传的各种性状，也还有个变异问题。否则，生物界如何能够不断地进化和发展呢？如果生物的上代和下代“完全一样”、“分毫不差”，那末，恐怕时至今天，博士自己还没有走出原始森林，更谈不上什么“复制天才”了。至于说到细胞质和母体的影响，大量科学事实已经证明：核、质是互相依赖和互相渗透的统一体，细胞质里的细胞器有重要的遗传作用，而在动物或植物杂交时，同一亲本组合正交和反交的结果往往不同，等等。当然，博士只能闭眼不看这些事实，否则搅乱了他的思路，复制不出天才来，岂不让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政客们失望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切科学都是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凡是有意违反客观规律的伪科学，在政治上一定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博士的用心何在，请看下文。

博士说：“人们生来不仅外表上不同，而且内在（对不同疾病的敏感，性格的特点，其能力和才能）也不同。在人们中间有智力迟钝，具有严重遗传病的人，也有特别有禀赋的天才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演员。”“有特殊天赋的人的出生总是偶然的，是难能可贵的基因组合，是我们不能预料的组合体”。因此，就非常有必要来“保留和增加这些最稀罕的，现在已有的组合体”，以“改良人的本质”，推



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我们应该注意，尽管博士用了不少科学词句，而中心思想却不是自然科学问题。虽然博士郑重地声明，他的主张与“法西斯分子和种族主义者的伪科学谰言”“毫无关系”。但是，熟悉博士这类御用学者的人们知道，只要他们急切地表白自己同某种反动思潮无关，那就恰好从反面说明，他们同这种思潮有难以割断的联系。况且博士的话已经说得十分清楚，实在使人无法怀疑他的高论正是一篇货真价实的法西斯种族主义的“复制”。

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博士的老前辈——优生学的鼻祖高尔敦提出过人类天赋才能的等级“理论”，胡说白种人中的盎格鲁-撒克逊族居于优等第一，而黑人是最下等，并且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战争的制止、医学的发展、大规模传染病的被防治等都是可恨的事情，因为这一切妨碍了淘汰“劣等人”、繁殖“优等人”的自然选择过程，要引起人种退化，所以提出要“改良人种”，也就是博士所讲的“改良人的本质”。

美国优生学家弗利门说：优生学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是完全不平等的。优生学的目标是在于使较高的树枝继续生长，而铲除较低的树枝”。

法西斯德国的种族主义者曾经鼓吹：“雅利安人至上”，有权征服“劣等民族”，有权统治全世界。

读了前后引文不难看出，博士的“复制天才”论和历来的种族主义“理论”多么相同，用博士自己最时髦的话说，真象是通过“细胞核”移植产生的“孪生弟兄”，不过这个“细胞核”的先天性不是别的，正是博士及其前辈们共同的帝国主义者的反动阶级本性。“改良人种”、“改良人的本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这一直是新老种族主义者的共同旗帜。但是，什么是人的本质呢？怎样才能推动社会进步呢？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里就是阶级关系的总和，就是人的阶级本质。人的这种本质只能通过阶级斗争来加以改造。人类的阶级社会，也只能通过阶级斗争才能不断进步。苏修叛徒集团之所以竭力散布用科学方法“改良人的本质”、推动“社会进步”的谬论，不过是妄想麻痹人民，转移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方向而已。但是，和历来的种族主义者的下场一样，“复制天才”这种新的种族主义也挽救不了苏修统治集团的命运。

人的聪明才智到底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定地认为，才能来自实践。毛主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



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恩格斯认为，一切知识包括数学这类看来非常抽象的知识，都是从实践中来的。人脑本身就是进化的产物。由于地质上的变迁，类人猿走出了森林，在漫长的时间里逐渐地直立起来，手和脚分了工，终于学会了制造工具和劳动，在劳动中创造了手，随着也创造了语言。“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显然，人脑是劳动的产物，人的才能、智慧、知识当然也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即人脑这个“加工厂”对客观世界能动的反映的产物。一个人不管其祖先有多高的才能，如果他一出生便闭目塞听，脱离实践，就一定只能象白痴一样，而不会成为什么天才。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才智是天赋的，一切才能都是实践赋予的、劳动赋予的、群众赋予的，是后天决定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历来的剥削阶级都要宣传这种违反科学的“天生不平等”的宿命论呢？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唯心论者的话说，就是要“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在博士那里，也就是应该由少数复辟的资产阶级贵族来统治。这就是“复制天才”论所追求的政治答案。

除了聪明、才能、天才是先天决定的以外，博士还告诉我们，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天才们推动的。博士说：“真正的天才”虽说是“个别人”，“但是整个人类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于这些人”。博士哀叹道：“我们的世界离开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和陀思妥也夫斯基，离开牛顿，罗巴切夫斯基，达尔文和爱因斯坦将会是怎么个样子呢？”不得了，至少人类的文明要消失了，甚至地球也停止转动了，因为照唯心主义者看来，没有“天才”去发现地球的转动，连地球本身都是不存在的。且不论对这些人物本身的评价，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到底科学文化是谁创造的？到底谁是历史的主人？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主张，**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对于历史上一切有贡献的科学家、进步的艺术家的成就，我们从来认为，应当给予应有的历史评价。但是评价这些人物决不能离开那个时代，更不能离开作为这些成就的基础的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和创造。离开群众和群众所创造的时代，这些人物根本不可能出现。“**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进步的文学艺术，则是人民生活在进步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从根本上说，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任何



天才都创造不出任何进步的文化艺术来。科学更是如此。无论什么科学发明都离不开社会实践，都是以生产的发展、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实践为基础的，都是以科学知识的不断积累为基础的。因此，任何重大的科学成就都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以进化论来说，十九世纪前期社会生产的发展，动植物选种的新成就，解剖学、古生物学、分类学、生物学等科学资料的积累，以及拉马克学说的问世，都为进化论的产生创造了社会的必然前提，然后达尔文和华莱士几乎同时在不同的地方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理论。到底由谁首先提出进化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带有偶然性，但是进化理论一定要出现，则是为历史发展所决定的必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我们说，科学艺术也好，整个人类历史也好，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这是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这里顺便提醒一下，就连苏修统治集团的最终命运也要由劳动人民来决定，这同样也是无法改变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最后，博士充满信心地说，“也许我们这一代就将看到”复制天才的成功。但是，紧接着他又交待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应该记住，这里所述的方法无论怎样完善，它只能涉及到生出几十，几百，可能几千个人，就是说在几百万按普通方法出生的居民中总是占极小部分”。读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天才”、“智者”如此了不得，既然“复制天才”的理论和方法又如此稳妥可靠，而且可以在“我们这一代就将看到”，那么，为什么还“应该记住”，只能复制出“极小部分”而不大量复制呢？什么原因，博士没有说明。

不过，也无须说明。原来他们并不希望人人都成为“天才”。不然“天才”多如牛毛，谁还去从事“卑贱的”“普通的”体力劳动呢？没有奴隶去为他们种地、做工、裁衣、做饭，难道让“天才”们饿着肚子、光着身子去从事伟大的“天才”活动吗？现在，一切都清楚了，他们所要的社会不过是一小撮剥削阶级统治者横行霸道，广大劳动人民供人奴役的社会，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所谓“复制天才”就是复制苏修叛徒集团的后代而已。

读完博士的论文，实在令人气愤，但又令人痛心。请看，列宁的故乡被苏修叛徒集团糟蹋成了什么样子！他们在政治上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随之而来的是，经济上危机四伏，日趋衰退；文化上腐朽不堪，毒草丛生。科学上如何呢？这位博士的高论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严肃的科学事业也已经被引上了堕落的道路！这怎么能不引起苏联劳动人民和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愤怒和反抗呢？

